

# 《玄怪錄》幻設的跡證及其作意探究

康韻梅\*

## 〔摘要〕

本篇論文針對唐代重要小說集牛僧孺《玄怪錄》，為小說史家指陳與唐代小說常見「徵實起信」相反的「顯示幻設」之敘事特色作一探究，辨析今日可見及的文本內容所呈現的人物命名之虛構化、故事時空背景與現實的脫離、擬人化與諧隱的修辭、以志怪題材為撰作憑藉等，作為該書「顯示幻設」的跡證，同時抉發出牛僧孺「顯示幻設」實出於好奇語誕、以示文才、寄寓思理、關切時事等作意，回應歷來對《玄怪錄》所作「多造隱語」和「寓言」的評價，進而突顯《玄怪錄》兼具興趣和興奇的撰作意旨。

關鍵詞：唐代小說、牛僧孺、玄怪錄、續玄怪錄、幻設、寓言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一、前言

歷來的文學史家和小說史家，都觀察出唐代小說大抵以兩種形式傳於後世，一為單篇，一為專集。前者多為眾人矚目的名篇，經歷晚唐陳翰編選的《異聞集》，通過唐代小說初次結集經典化的篩檢，<sup>1</sup>又北宋類書《太平廣記》以「雜傳記」的名義收錄，使得這些單篇文本成為唐代傳奇的典型。然而根據李劍國的統計，今存與可以考見的唐代小說，大概有一百多種單篇傳奇和百多種專集，<sup>2</sup>為數相當可觀；唐文宗大和（827-835）中至唐僖宗乾符（874-879）末是傳奇集的興盛期，<sup>3</sup>即小說專集在此之後成為唐代小說發展的主體。《玄怪錄》是唐代小說集中極為重要的作品，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述及唐代傳奇集時特別指出：「造傳奇之文，會萃為一集者，在唐代多有，而煊赫莫如牛僧孺之《玄怪錄》。」<sup>4</sup>魯迅認為在諸多唐代小說集中，以牛僧孺（779-848）《玄怪錄》的名聲最大，當然這或與牛僧孺的政治地位不無關連。汪辟疆《唐人小說》則明確衡量文辭，盛讚《玄怪錄》，認為研治唐代小說者必須注意這部作品：「今牛氏書既已久佚，惟《太平廣記》尚存三十三篇，文辭雅潔，允推作者。治唐人小說者，不可不肄及之也。」<sup>5</sup>從藝術本位進行的觀察，給予相當的肯定。

除了《玄怪錄》的撰作之外，牛僧孺與唐代小說的關係實屬密切，王夢鷗〈牛僧孺的政治生涯考述〉一文對於牛僧孺的一生經歷，大量引用唐代小說載記的內容。<sup>6</sup>唐代小說另一名篇〈周秦行紀〉即是以牛僧孺為主人翁，甚至被視為該篇作者，宋人則認為是李德裕（787-850）門人韋瓘（789-？）所作，撰作目的極可能是意圖誣陷牛僧孺對德宗不敬；該說法已為近人推翻，強調〈周秦行紀〉、〈周秦行紀論〉皆屬晚唐人委託。<sup>7</sup>〈周秦行紀論〉呼應了〈周秦行紀〉抨擊牛僧孺的

<sup>1</sup> 陳珪認為唐代傳奇文經過三次經典化的結集，第一次就是晚唐陳翰編選《異聞集》。見氏：《初唐傳奇文鈞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38。

<sup>2</sup> 見氏：《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37。

<sup>3</sup> 同前註，頁42。

<sup>4</sup> 見氏：《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小說史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3年），頁77。

<sup>5</sup> 見氏：《唐人小說》（臺北：世界書局，1980年），頁195。

<sup>6</sup> 見氏：〈牛僧孺的政治生涯考述〉，《唐人小說研究四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78年），頁164-181。

<sup>7</sup> 詳見〔唐〕李德裕著，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

觀點，涉及了《玄怪錄》一書：「及見著《玄怪錄》，多造隱語，人不可解，其或能曉一二者，必附會焉。」<sup>8</sup>王夢鷗點明〈周秦行紀論〉是關於《玄怪錄》一書最早的評語，並且對於「隱語」一詞加以詮釋，認為「所謂『隱語』，當為寓言無稽之談，如今傳本中之〈元無有〉、〈和神國〉等篇，恰即如此。」<sup>9</sup>事實上自從〈周秦行紀論〉提出「多造隱語」一說之後，後世多見有從「寓言」以界定《玄怪錄》者，例如宋人洪邁在《夷堅乙志·序》中論定《玄怪錄》為寓言之作。<sup>10</sup>又例如明代胡應麟最為著名的討論唐代小說的話語中，亦涉及〈元無有〉一篇，即《少室山房筆叢·二酉綴遺中》所謂：

凡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如〈毛穎〉〈南柯〉之類尚可，若〈東陽夜怪〉稱成自虛，《玄怪錄》元無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氣亦卑下亡足論。<sup>11</sup>

認為〈東陽夜怪錄〉和《玄怪錄·元無有》之作毫無寄託，文氣又卑下無足論。然而於〈莊嶽委談上〉，胡應麟論及《玄怪錄》〈岑順〉一篇敘述岑順夜夢象戲局、車、馬具等精怪之事，認為「此或文士寓談，然唐人象戲之製賴此可考。」<sup>12</sup>另外，在〈玉壺遐覽三〉中，胡應麟認為「唐人好奇語誕什倍宋時，如《玄怪》、《杜陽》、《異聞》、《甘饌》之類，往往假稱神怪以自發其詞」<sup>13</sup>可見胡應麟以《玄怪錄》為唐代「文士寓談」、「好奇語誕」的代表作品。

藉由以上指陳的「多造隱語」、「寓言」、「寓言無稽之談」、「作意好奇……但可付之一笑」、「文士寓談」、「好奇語誕」、「假稱神怪以自發其詞」等評

版社，2000年），頁701。

<sup>8</sup> 同前註。

<sup>9</sup> 見氏：〈《玄怪錄》及其後繼作品辨略〉，《唐人小說研究四集》，頁2。

<sup>10</sup> 《夷堅乙志·序》：「夫齊諧之志怪，莊周之談天，虛無幻茫，不可致詰。逮干寶之《搜神》，奇章公之《玄怪》，谷神子之《博異》，《河東》之記，《宣室》之志，《稽神》之錄，皆不能無寓言於其間。」〔宋〕洪邁著，〔清〕阮元輯編：《夷堅志乙》（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1。

<sup>11</sup> 見氏：《少室山房筆叢》（上海：上海書店，2009年），頁371。

<sup>12</sup> 同前註，頁419。在此胡應麟認為雖然〈岑順〉所記古墓中象戲行馬之事誠屬荒謬，但可從中得知唐代象戲進行的實況。

<sup>13</sup> 同前註，頁464。

語，顯示《玄怪錄》全書之「玄」、「怪」的特質與該特質係屬牛僧孺刻意為之。魯迅曾經對該書進行綜述：

僧孺性堅僻，而頗嗜志怪，所撰《玄怪錄》十卷，今已佚，然《太平廣記》所引尚三十三篇，可以攷見大概。其文雖與他傳奇無甚異，而時時示人以出於造作，不求見信；蓋李公佐、李朝威輩，僅在顯揚筆妙，故尚不肯言事狀之虛，至僧孺乃並欲以構想之幻自見，因故示其詭設之迹矣。〈元無有〉即其一例。<sup>14</sup>

魯迅提出一己閱讀《太平廣記》所輯存的《玄怪錄》三十三篇文本的心得，認為《玄怪錄》與其他傳奇無甚差異，獨特之處在於《玄怪錄》的文本刻意彰顯其敘事出於造作，不期待讀者相信其事為真實，並且以〈元無有〉為例展示該撰作風格。魯迅特別將此撰作風格與李公佐、李朝威之作參照，認為李公佐、李朝威創作時會彰顯撰作文筆的奇妙，但是不會明白表述所記之事出於虛構，至於牛僧孺則刻意流露出所記事件是出於幻設的跡證。雖然魯迅並未明說李公佐、李朝威的作品所指為何，但是從魯迅關於古典小說之觀點深受胡應麟影響的事實進行推論，如前所述，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二酉綴遺中》是以李公佐的〈南柯太守傳〉與〈元無有〉對照、並提；又且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二酉綴遺中》批評柳毅故事「鄙誕不根」，<sup>15</sup> 基此推論魯迅未明言的李公佐、李朝威的作品殆為〈南柯太守傳〉和〈柳毅〉。李公佐〈南柯太守傳〉、李朝威〈柳毅〉，一涉蟻妖、一及龍女，皆為幻設之作，無獨有偶的是作者都在文本中現身說法。李公佐在〈南柯太守傳〉文末，敘述了貞元十一年與故事主人翁淳于棼見面，並且尋訪遺跡，證實其事為真，進而編錄成傳之事；<sup>16</sup> 至於李朝威則於文末述說柳毅的表弟京畿令薛嘏，貶官東南之時路經洞庭與柳毅相會，並且獲贈仙藥，進而不斷傳揚之事，李朝威還說明自己因此事有感而撰作。兩位作者似乎有意直接、或間接地證實所述事件的真實性，現存李公佐其他的唐傳奇之作，例如〈謝小娥〉、〈廬江馮媼傳〉、〈古嶽瀆經〉等都可以見及類似情況，殆可理解魯迅對二人所作「不示其虛」的

<sup>14</sup> 見氏：《中國小說史略》，頁 77。

<sup>15</sup> 見氏：《少室山房筆叢》，頁 370。

<sup>16</sup> 〈南柯太守傳〉本作「貞元十八年」，王夢鷗認為是字形相近之誤，應為「貞元十一年」。見氏：《唐人小說校釋》（臺北：正中書局，1988 年），冊下，頁 187-188。

評價，甚至還可以說作者刻意親自印證所記之實。然而魯迅觀察到牛僧孺不同於二者的敘述特色，在於其作品中有意彰顯所記是出於虛構。汪辟疆持類似看法：

凡小說至貞元元和之間，作者雲起，情文交互，靡不備具本原，掩其虛飾。而僧孺於顯揚筆妙之餘，時露其詭設之迹。如其書中之〈元無有〉一條，觀其標題命名之旨，已自託於烏有亡是之倫，與昌黎之傳〈毛穎〉，柳州之紀〈河間〉，固同一用心也。<sup>17</sup>

汪辟疆不僅提出牛僧孺於文本中不時顯露詭設之跡，甚至還以〈元無有〉為例說明牛僧孺在標題命名上展現該一敘述特色，因而將其撰作動機比擬於韓愈撰寫〈毛穎傳〉、柳宗元創作〈河間傳〉，認為其中有所寄寓，甚至以此反駁了胡應麟對〈元無有〉的批評。<sup>18</sup>魯迅揭示了《玄怪錄》有意於文本顯示幻設的敘述特色，汪辟疆則進一步去闡釋此敘述特色的體現和用意。

明代高儒的《百川書志》卷八收錄了題為「幽怪錄」的《玄怪錄》，高儒對於全書的評價卻是：「唐隴西牛僧孺撰，載隋唐神奇鬼異之事，各據聞見出處，起信於人，凡四十四事。」<sup>19</sup>高儒指出《玄怪錄》所記內容為隋唐的神鬼奇異，同時說明是牛僧孺依據見聞所記，欲使人相信其事為真。高儒的說法顯然與假託為李德裕者、胡應麟、魯迅、汪辟疆、王夢鷗等人的觀點有別，高儒何故下此論斷，殆因《百川書志》本的《幽怪錄》滲入了一些《續玄怪錄》的文本，例如〈張老〉、〈尼妙寂〉、〈黨氏女〉、〈齊饒州〉、〈許元長〉、〈葉氏婦〉等篇，<sup>20</sup>這些文

<sup>17</sup> 見氏：《唐人小說》，頁195。

<sup>18</sup> 汪辟疆與魯迅的觀點相同，認為〈元無有〉是《玄怪錄》顯露詭設之跡撰作風格的代表，然他更進一步指出胡應麟是出於衛道的觀念，詆毀〈元無有〉一篇。同前註。

<sup>19</sup> 〔明〕高儒著：《百川書志》（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頁116。

<sup>20</sup> 現今研究《玄怪錄》，存有兩個根本的問題，一是原書已散佚，一是可見最早的明刻本已與《續玄怪錄》混雜。關於《玄怪錄》與《續玄怪錄》文本混淆的情形。程毅中認為一己所校點明代高承埏刻本十一卷《玄怪錄》四十四篇中，〈尼妙寂〉、〈張老〉、〈王國良〉、〈齊饒州〉、〈葉氏婦〉、〈李沈〉、〈黨氏女〉、〈張寵奴〉等，應為《玄怪錄》作品。詳見〔唐〕牛僧孺撰，李復言撰，程毅中點校：《玄怪錄續玄怪錄》（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前言〉，頁11-18。李劍國認為〈張老〉、〈尼妙寂〉、〈王國良〉、〈齊饒州〉、〈葉氏婦〉、〈黨氏女〉、〈許元長〉為《續玄怪錄》篇目。〈崔環〉、〈吳全素〉、〈掠剩使〉、〈馬僕射總〉、〈李沈〉疑為《續玄怪錄》之作。見氏：《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頁801-804。

徐志平亦指出明代陳應翔刻本《玄怪錄》中〈杜子春〉、〈張老〉、〈裴謚〉、〈尼妙寂〉、〈王國良〉、〈張寵奴〉、〈葉氏婦〉、〈黨氏女〉等篇實是《續玄怪錄》的作品，見氏：〈明刻本《幽怪錄》對《續玄怪錄》研究的價值〉，原發表於中興大學《文史學報》第21期（1991年3月），頁9-28。後收錄於《續玄怪錄研究》（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年），附錄，頁139-148。可見諸家對於明刻本《玄怪錄》被《續玄怪錄》混入的作品，有高度的共識，但也有參差之處。其中最爭議的是〈杜子春〉一篇，也延伸及〈裴謚〉一篇歸屬的問題。《太平廣記》卷16收錄〈杜子春〉，並註明出自《續玄怪錄》，王夢鷗以牛書敘事，多托於唐代以前；〈杜子春〉曰「周隋」而不曰「陳隋」，是當時北方人之長詞，牛氏和李復言籍貫皆是西北，但薛漁思《河東記》為續牛書之作，其中〈蕭洞玄〉一篇後半與〈杜子春〉相似；牛氏與白居易親善，撰作〈杜子春〉如同白居易〈夢仙詩〉所表達偏好道術又深知其難，而取材自《大唐西域記》烈士池故事，與牛氏所撰〈張左〉、〈居延部落〉言吞吐之術，取材於六朝志怪相仿；宋本《續玄怪錄》不收〈杜子春〉，也許因為當時所見《太平廣記》其篇末不注出《續玄怪錄》等理由，判定〈杜子春〉為牛氏之作。見氏：〈《玄怪錄》及其後繼作品辨略下〉，《唐人小說研究四集》，頁39-40。李劍國以事託周隋，確定〈杜子春〉為牛僧孺所作。也以同樣觀點確定〈裴謚〉是出於《玄怪錄》。見氏著，《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頁792。李時人認為陳應翔刻本與《類說》皆將〈杜子春〉列為首篇，很難斷定是誤植，而且《續玄怪錄》的作者李復言為落魄舉子，其書多窮達命定之感慨，氣度風格與〈杜子春〉不合。故將〈杜子春〉歸於《玄怪錄》。見氏：《全唐五代小說》（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838。然汪辟疆《唐人傳奇》則依從《太平廣記》，認為〈杜子春〉出於《續玄怪錄》，吳玉蓮則對於王夢鷗所提觀點一一反駁，認為李復言亦藉西北，〈杜子春〉未必為牛氏所作；《河東記·蕭洞玄》可能直接出自《大唐西域記》而非《玄怪錄》；牛氏玄怪題材多託久遠之事，且無記載人生現實生活，〈杜子春〉三分之一以上內容在敘寫人世生活；牛書中無煉丹難成之說，李書卻有〈李紳〉、〈裴謚〉皆與〈杜子春〉有塵念未消、學道無成之主題；以字數而言，牛書長篇者少，全書風格近於六朝志怪，〈杜子春〉較不相類；牛書長篇有所本僅有〈張左〉本於〈陽羨書生〉，李書多篇長篇都有所本，〈杜子春〉亦是；牛氏好道術，牛書甚少嚴肅主題，不刻意闡釋某種人生觀和倫理渲染，李氏信佛樂道，〈杜子春〉有抑道伸佛之處和充滿人間思想主題，與牛氏相違。而力主出於《續玄怪錄》。見氏：〈〈杜子春〉讀後〉，《文藝月刊》156期（1982年6月），頁88-91。徐志平則接受吳玉蓮之說，並申述針對王夢鷗撰作時代，指出《玄怪錄》確已有八篇託唐代以前，但《續玄怪錄》亦見有〈李衛公靖〉、〈裴謚〉是作於唐前；宋本《續玄怪錄》未收〈杜子春〉，不能為證，因為宋本《續玄怪錄》已失落者甚眾；《太平廣記》將〈杜子春〉與〈張老〉列於同卷，王夢鷗因此而證明兩篇都是出於《玄怪錄》，如今陳刻本證明〈張老〉為李氏之作，〈杜子春〉應亦是。因而主張〈杜子春〉為《續玄怪錄》作品。見氏：〈明刻本《幽怪錄》對《續玄怪錄》研究的價值〉，收錄於《續玄怪錄研究》附錄，頁145。學界

本末尾，都出現近似於李公佐、李朝威以作者之姿見證所記之事實有憑據的敘述。例如：

貞元進士李公者，知鹽鐵院，聞從事韓準太和初與甥姪語怪，命余纂而錄之（〈張老〉）<sup>21</sup>

太和庚戌歲，隴西李復言游巴南，與進士沈田會於蓬州，田因話奇事，持以相示，一覽而復之。錄怪之日，遂纂於此焉。（〈尼妙寂〉）

太和壬子歲，通王府功曹趙遵約言之，故錄之耳。（〈黨氏女〉）

余聞之已久，或未深信。太和二年秋，富平尉宋堅，因坐中言及奇事，客有王府參軍張奇者，即韋之外弟，具言斯事，無差舊聞，且曰：「齊嫂見在，自歸復已來，精神容飾，殊勝舊日。」冥吏之理於幽晦也，豈虛言哉！（〈齊饒州〉）

對於〈杜子春〉是牛氏還是李氏之作，各執兩端，至今仍分歧，若依據敘事篇幅和用語，以及主題，〈杜子春〉確實較接近《續玄怪錄》，在《續玄怪錄》中特別多仙／凡拉鉅涉及修道必須摒棄人倫的作品，如〈楊敬真〉一篇中，楊敬真上仙復歸人間，是為了侍養公公；〈麒麟客〉仙人王夔論及一己修習道業經六七劫，「迴視委骸，積如山嶽。四大海水，半是吾宿世父母妻子別泣之淚。」，確實為揉合道釋觀點談成仙對人倫的揚棄。此外，〈杜子春〉中，敘述杜子春妻子被施行酷刑連用「或」字句，和杜子春在地獄受的苦難所用多項同質內容並列的句式，多與李劍國指出《續玄怪錄》習慣用語相似。可見〈杜子春〉很有可能是出於《續玄怪錄》。至於〈裴謚〉一篇，王夢鷗以其文句蕪累，間用偶體，與牛氏簡約風格不符，而〈裴謚〉文末模仿《禮記·月令》的文句，亦見於《續玄怪錄》的〈韋氏子〉之中，而將之歸為李書。見氏：《〈玄怪錄〉及其後繼作品辨略下》，《唐人小說研究四集》，頁40。程毅中仍將之歸於《玄怪錄》，李劍國亦因其故事年代而將之認定為牛氏之作。本論文依據上述的辨析，認為〈杜子春〉、〈張老〉、〈裴謚〉三篇撰作主旨相近的作品歸於《續玄怪錄》可能性較大，故不納入討論《玄怪錄》的範疇，同時摒除可確切為《續玄怪錄》的〈張老〉、〈尼妙寂〉、〈黨氏女〉、〈齊饒州〉、〈許元長〉、〈王國良〉、〈張寵奴〉、〈葉氏婦〉、〈李沈〉等篇。

<sup>21</sup> [唐]牛僧孺撰，李復言撰，程毅中點校：《玄怪錄續玄怪錄》，頁11。本篇引用《玄怪錄》文本，皆據此一以明末高承埏稽古堂刻本為底本，參校明代陳應翔刻本和《太平廣記》之版本，以下引文，不另贅注。

太和壬子歲得知其事於武寧曹侍郎弘真處，因備錄之。（〈許元長〉）

楊曙方宰中牟，聞此說，乃召而問之，一無謬矣。（〈葉氏婦〉）

程毅中特別指出李復言寫作《續玄怪錄》的特點之一，便是有意說明聽誰講的故事，以取信於人，同時可以讓別人分擔文責。而此鮮明的寫作特色，卻因為文本誤植入《玄怪錄》而導致此一特色也因之過渡到牛僧孺。<sup>22</sup>但檢視確定出自牛僧孺的文本，則有類似的敘述：

前進士張左，嘗為叔父言。（〈張左〉）

茲昭應縣尉薛公幹為僧孺叔父言也。（〈劉法師〉）

此傳之僕人，故備書焉。（〈王煌〉）

這些敘述雖然不如《續玄怪錄》引證詳備，但的確是牛僧孺親自取諸見聞而記述，可見高儒的評論亦有其據，並非完全落空。如此一來，便可進一步確定《玄怪錄》兼具了「顯示幻設」和「見聞起信」兩種撰作特質，然而從唐代小說的撰作多傾向於「見聞起信」以徵實而觀，「顯示幻設」顯然是逆向操作，所以才被諸家關注，而此逆向操作又遍見於全書而引發學者注目。至於《玄怪錄》於文本中如何自見構想之幻、顯露詭設之跡，以及牛僧孺何以採取此顯示幻設的敘述策略？則未得到充分而完備的討論，亟須較為深入的抉發，尤其〈元無有〉一篇歷來被集中關注，卻獲致「可付之一笑」、「文氣卑下不足論」的批判，以及與韓愈〈毛穎傳〉、柳宗元〈河間傳〉以虛構托言並提。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則更為強烈地引發出進一步探究牛僧孺自見幻構、顯露詭設作意的意念。

## 二、《玄怪錄》文本顯示幻設的跡證

如前所述，自托名李德裕所撰的〈周秦行紀論〉對牛僧孺《玄怪錄》提出「隱

---

<sup>22</sup> 同前註，「前言」，頁12-18。



語」一說，可謂為全書的虛構性質定調，直至現當代研治小說的學者才注意到全書刻意顯示虛構性的敘述特質，至於如何在文本中顯示所書寫的內容是虛構的，也得到學者們一些較為具體的指陳。例如王夢鷗觀察《玄怪錄》的故事題材「好託言久遠之事，且幾無記載生人之現實生活」<sup>23</sup>，李宗為指出《玄怪錄》明顯地「不求取信於人，故於人物或不述出處，或徑以『元無有』為名故示人以詭設虛構的跡象」，<sup>24</sup>甚至「故事年代悉不取當時」、「在文末作者多不具故事的出處來源」，並且「一概不發任何寓有戒勸之意的議論」等。<sup>25</sup>李劍國則認為《玄怪錄》「它淡化了背景的歷史明確性——即有意借助確切的人物、時間、地點來增加可信性以掩蓋虛構，——而是常托之古往以顯示其虛構，從而盡情寫其藻思。」<sup>26</sup>本篇試圖檢視目前可判定為《玄怪錄》的文本，進而衡酌諸家所提觀點，分別從人物命名的虛構化、故事時空背景與現實的脫離、擬人化和諧隱的修辭、以「志怪」題材為撰作憑藉等面向，來討論《玄怪錄》如何自見構想之幻，顯露詭設之跡。

### （一）人物命名的虛構化

唐代小說基本是出以「傳」、「記」的形式，敘事多以人物為主，尤其保存唐代小說最多的《太平廣記》基本上以人物為題，是故唐代小說的人物往往為讀者矚目的焦點，當然其中有實有的歷史人物，亦有虛構的人物，然而虛構的人物多以「擬真」之姿出現，具體交代其所處之歷史時空背景和合理的行事，以示實有其人。但是《玄怪錄》在人物命名上，出現了刻意虛構化的現象，即徑以人物的名字來傳達所述為假，不足以為信，例如〈元無有〉一篇主人翁命名為「元無有」。程毅中認為雖然故事情節並不新鮮，此一命名，顯然出於有意識的假托，因而和某些作者有意標榜為親見親聞的實錄，明顯地不同。<sup>27</sup>楊義指出「元無有」的命名實具拆解虛構幻設的魔方，令讀者知其子虛烏有的意義。<sup>28</sup>而與〈元無有〉相類的故事〈騰庭俊〉中的主人翁名為「騰庭俊」，李劍國分以「原本無有之事」與「俊語誕詞騰人聽聞」釋之，並言：「此猶終無為、賈全虛、成自虛、王無有

<sup>23</sup> 見氏：〈《玄怪錄》及其後繼作品辨略〉，《唐人小說研究四集》，頁 23。

<sup>24</sup> 見氏：《唐人傳奇》（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頁 115。

<sup>25</sup> 同前註，頁 49。

<sup>26</sup> 見氏：《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頁 52。

<sup>27</sup> 見氏：《唐代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年），頁 188。

<sup>28</sup> 見氏：《中國古典小說史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頁 158。

之屬，蓋本乎賦家子虛烏有亡是公之設」，<sup>29</sup>將唐代小說如是虛構化的人物命名，統而論之。事實上，這些故事主人翁的命名是有前後影響關係的。<sup>30</sup>

又〈古元之〉一篇中的主人翁名為「古元之」，王夢鷗指出「『元』與『玄』通用，元之就是玄之，按其取名，當與『亡是公』『烏有先生』為同類」。<sup>31</sup>關於古元之，高承埏刻本言其「不知何許人也。」《太平廣記》則敘述「後魏尚書令古弼族子元之」，<sup>32</sup>前者的陳述，更加突顯「古元之」子虛烏有之意，若與《太平廣記》記述帶古元之至和神國的遠祖是「古說」配搭而觀，<sup>33</sup>則更具虛假不實的意涵，因為「古說」即「古代傳說」之意。而高本則記述將帶古元之至和神國的遠祖是「古弼」，王夢鷗由《魏書·古弼傳》記載因古弼奏事敏正，太宗曾賜名「筆」，「取其直而有用，後改名『弼』，言其輔佐材也」又記載：「弼頭尖，世祖常名之曰『筆頭』，是以時人呼為『筆公』」，<sup>34</sup>認為牛僧孺托以「筆公」的姓名，將《列子》中的「華胥國」擴大描寫，而將之牽繫到韓愈的〈毛穎傳〉，進而從王定保的《摭言》記述牛僧孺受到韓愈的揄揚和李珣〈故丞相太子少師贈太尉牛公神道碑〉言兩人為「文章友」，而推斷牛僧孺受韓愈影響而寫〈古元之〉。<sup>35</sup>關於牛僧孺《玄怪錄》與韓愈的關係，容後再申述。但王夢鷗揭示《魏書》所載「古弼」即「古筆」，而「古筆」和「古說」應具有同樣的意涵，就是書寫古代故事。其間所寓含的虛構意義，實不言可喻。〈景生〉中將實有歷史人物「呂湮」改為「呂譚」，「張仁願」改為「張或然」，「譚」和「或然」都隱含有傳說、虛設的意味。

此外，〈王煌〉故事中指出王煌遇威神之鬼的道士名為「任玄言」，亦予人任意作玄虛之言的設想。〈吳全素〉遊歷冥界的「吳全素」和〈華山客〉中與狐

<sup>29</sup> 見氏：《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頁 91。

<sup>30</sup> 李宗為指出牛僧孺效法牛肅《紀聞》中命名人物為「王無有」而名人物為「元無有」。見氏：《唐人小說》，頁 49。而「成自虛」是〈東陽夜怪錄〉中人物的名字，「終無為」是《河東記·蕭洞玄》故事中人物，皆晚於《玄怪錄》，「賈全虛」出自〈侍兒小名錄〉，時代更晚。

<sup>31</sup> 見氏：〈牛僧孺的幻想國〉，《唐人小說研究四集》，頁 156。

<sup>32</sup>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 年），頁 3056。

<sup>33</sup> 同前註，頁 3057。

<sup>34</sup> 〔北齊〕魏收撰：《魏書》（臺北：洪氏出版社，1977 年），頁 689、頁 692。

<sup>35</sup> 見氏：〈牛僧孺的幻想國〉，《唐人小說研究四集》，頁 157。

仙邂逅的「黨超元」，主人翁的命名都玄虛意味十足，與書名「玄怪」相應。由「元無有」、「古元之」、「任玄言」、「吳全素」、「黨超元」的命名，就可以得知牛僧孺刻意地告訴讀者所敘述的事件是虛構的，來為其所述故事定調。這樣的虛構化的人物命名亦偶見於其他唐代小說，但《玄怪錄》卻頻頻出現，則鮮明地傳達出牛僧孺自見其構想之幻的意圖。

## （二）故事時空背景與現實的脫離

除了在「人物命名」上可見顯露幻設的跡證外，《玄怪錄》「淡化背景的歷史明確性」和「故事年代不取於當世」甚至「托於遠古」，亦是牛僧孺顯示其幻設的手法。雖然《玄怪錄》中的敘事大部分對於故事發生的時間和地點還是作清楚的交代，但仍對不少故事的時空背景作不同的處理。首先是《玄怪錄》中有多則故事不記年代；其次則是多敘述唐代以前的故事，同時還交錯展現不同時代的歷史人物，讓時空錯置；最為特別的是顛倒歷史事實。

在現今可判斷為《玄怪錄》的文本中，不記年代者有〈盧公渙〉、〈杜巫〉、〈魏朋〉、〈韋協律兄〉、〈蘇履霜〉、〈景生〉、〈盧頊表姨〉、〈狐誦通天經〉等。這些故事沒有明確的時間座標。而〈古元之〉若依據高本則是「不知何許人也」，亦可屬於此類。

至於「故事背景不取於現世」的敘述手法在《玄怪錄》中更是遍見。雖然《玄怪錄》中有為數可觀的文本，是以唐代為背景，但亦有相當數量的故事發生時間設定在唐代以前，尤其是隋代。〈柳歸舜〉所述是「隋開皇九年」事，〈來君綽〉則以「隋煬帝」征遼為背景，〈顧總〉為「梁天監元年」事，〈周靜帝〉自然是涉及周靜帝時事，〈董慎〉則述「隋大業元年」事，〈袁洪兒誇郎〉的袁洪兒是陳朱崖太守，〈侯遜〉故事發生在「隋開皇初」，〈巴邛人〉是巴人一百五十年來相傳的故事，「似在陳隋之間，但不知的年號耳。」而〈古元之〉若依據《太平廣記》的版本則是後魏時事，可見《玄怪錄》喜談南北朝和隋代故事。〈張左〉故事中張左請老父賜言以廣見聞，老父回答「賢愚治亂，國史已具。然請以身所異者語子吾所見梁陳隋唐耳！」<sup>36</sup>所謂「梁陳隋唐」適足為《玄怪錄》文本時間背

<sup>36</sup> 〈張左〉文末所記：「（叟）因啟囊，出二軸書甚大，字頗細。左不能讀，請叟自宣，略述十餘事，其半昭然可紀。此卷八事，無非叟之所說。」正說明了《玄怪錄》何以多出現梁、陳、隋、唐事，但由於原書的編排無法復原，而無法辨識老叟為張左所言之八事為何。詳見賴信宏：《志怪到傳奇的遞嬗研究——述異話奇的書寫成規與知識利用》（花

景作註腳。《玄怪錄》的故事多托唐代以前，幾乎可以說是全書的一個敘述特徵，甚至成為釐析判定文本是否歸屬於《玄怪錄》的標準。<sup>37</sup>富永一登在分析〈杜子春〉的創作意圖時，指出該篇明明是唐代之故事，卻說成大概是周隋間的人，這意味著宣示接下來要說的故事是虛構的。<sup>38</sup>這個觀點也可以用以解釋牛僧孺將故事發生的時間多定於唐代之前，就是一自見其構想之幻的表現，如此一來，便使文本具有了「寓言」的特質。

牛僧孺不僅多述南北朝和隋代的故事，同時還在敘事上讓不同時代的歷史人物交錯出現，更加凸顯了幻設的敘述特質。例如，〈曹惠〉中曹惠家堂上的二木偶人是南朝宣城太守謝朓（464-499）家的俑偶，自述是沈約（441-513）家老蒼頭所造，即沈約在謝朓出殯時將俑偶作為謝朓陪葬，俑偶並陳述謝朓在冥中與原配王敬則（435-498）女不睦，另取樂廣（字彥輔，？-304）之女，而樂氏與殷仲文（？-407）和謝晦（390-426）的夫人相得。事實上樂廣為西晉時人，在真實的歷史時空中謝朓無法娶樂廣女，而樂家娘子亦罕能與處於東晉之時的殷仲文和謝晦夫人相得。更有趣的是謝朓在冥間任南曹典銓郎，與生前相距近兩百年的潘岳（247-300）同列，還十月一朝「晉、宋、齊、梁」，似乎歷史在冥間存續，歷史人物猶可穿梭其間並交會往來，即以冥間此一特殊的空間，拆解了時間的範限。類似的手法亦見於〈顧總〉一則，顧總為梁（502-557）之縣吏，因數被鞭捶而鬱鬱懷憤，而逃至墟墓，突然有二黃衣來見顧總，自稱王粲（177-217）、徐幹（171-218），並告訴顧總他的前生是劉楨（186-217），在坤明國任侍中，因收賄賂而謫為小吏，非常神奇的是他的家人仍安然存於坤明國，徐幹還將劉楨女兒思憶父親之詩交給顧總，顧總感動泣下也回覆了一首。王粲、徐幹二人還從袖中出五軸書示總，說是劉楨的集子，要顧總諦視，顧總省覽後，突然明悟而文思泉湧。而後顧總攜此劉楨集五卷，向縣宰呈報見王粲、徐幹的情形，並說出一己是劉楨的前生，縣宰立即解遣以賓禮待之。牛僧孺讓三國魏之王粲、徐幹來到南朝梁與顧總相遇，並透過一平行於此界的坤明國來解釋前世今生的關係及其連續性，文

蓮：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頁217。

<sup>37</sup> 王夢鷗將〈杜子春〉歸屬於《玄怪錄》而非《續玄怪錄》，依據的判斷之一，就是《玄怪錄》敘事，多托唐代之前，而〈杜子春〉正符合。見氏：〈《玄怪錄》及其後繼作品辨略〉，《唐人小說研究四集》，頁39。

<sup>38</sup> 見氏，盧秀滿譯：〈唐代小說之創作意圖——以「杜子春」為中心〉，收錄於林慶彰主編：《國際漢學論叢（第一輯）》（臺北：樂學書局，1999年），頁120。

本中顧總問「坤明」是何國，徐幹回應說是「魏武開國鄴地」，從歷史事實來看，「鄴地」從未建立過「坤明國」，可見為一杜撰的國度，復由顧總至墟墓見到王粲、徐幹，以及顧總的「前生」劉楨居於「坤明國」而觀，「坤明國」應為一類似冥界的所在，以「坤」為名，從《易·說卦》所言「坤為地」<sup>39</sup>而觀，殆有此暗示。無論是「冥界」或「坤明國」都是非現實世界的「他界」，在此「他界」中歷史延存，且不同時代的人物能夠會聚。〈袁洪兒誇郎〉的故事主人翁是陳朱崖太守袁洪兒，卻遇西晉王濟一家的昆弟女婿，甚至還與王氏親戚成婚，而從袁洪兒拜訪王宅的異境描寫和其妻子陳述兩人實殊途，顯示亦是利用他界會聚歷史人物。這樣利用此界與他界的空間區隔讓不同時代的歷史人物交會，是《玄怪錄》常見的幻設手法。<sup>40</sup>

關於《玄怪錄》的時空背景幻設，最為巧妙的是在文本中煞有介事地敘述歷史人物的遭遇，但其實是與歷史事實完全相反的情境，於是形成了實／虛的弔詭。最鮮明的例子是〈來君綽〉中敘述：「隋煬帝征遼，十二軍盡沒，總管來護坐法受戮，煬帝盡欲誅其子。君綽憂懼連誅，因與秀才羅巡、羅逖、李萬進結為奔走之友，共亡命至海州。」是與史實不符的，不僅將「來護」改為「來護兒」，還改竄事實，因為在《隋書》卷 64 中記述來護兒，因征討高麗有功而獲賜榮國公的爵位。<sup>41</sup>故事以與史實相反的敘述開始，即暗示這是荒唐虛構世界的表現手法。<sup>42</sup>至於在〈顧總〉一則中王粲自述因己短小，又娶了亦短小的樂進之女，而後則改娶了魁梧的劉表女兒，生了一既高大又聰明的兒子。根據史實王粲、樂進確皆為身形短小之輩，但關於娶妻生子的陳述則是虛構的，據《三國志·魏書·王母丘諸葛鄧鍾傳》裴松之注引《博物記》所述劉表曾有意嫁女予王粲，但嫌其外貌身材

<sup>39</sup> [魏]王弼著，樓宇烈校釋：《周易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頁 383。

<sup>40</sup> 〈周秦行紀〉中亦見類似的敘事特色，不免令人產生偽託牛僧孺者刻意模仿《玄怪錄》的設想。王夢鷗則認為〈劉諷〉一則中，劉諷夜宿空館，與群女談謔歌詠的情節，為〈周秦行紀〉所仿效。見氏：〈《玄怪錄》及其後繼作品辨略〉，《唐人小說研究四集》，頁 9。〈周秦行紀〉可謂兼具兩篇文本之特色，更彰顯出撰者刻意仿效牛僧孺書寫風格之用心。

<sup>41</sup> 「來護」應即「來護兒」，《隋書·來護兒傳》記述煬帝時，來護兒三戰高麗，封榮國公。[唐]魏徵等撰：《隋書》（臺北：洪氏出版社，1974 年），頁 1515-1516。

<sup>42</sup> 富永一登著，盧秀滿譯：〈唐代小說之創作意圖——以〈杜子春〉為中心〉，頁 120。富永一登認為〈杜子春〉究為誰作，現今已無法確知，但他依據《太平廣記》將〈杜子春〉視為《續玄怪錄》中的作品，但他在討論〈杜子春〉時，兼論及《玄怪錄》和《續玄怪錄》的特色。

而作罷，將之嫁予王粲的族兄王凱，二人生子王業。<sup>43</sup>後因王粲二子涉及到魏諷謀反而被誅，曹丕為了不讓王粲無後，將王業過繼給王粲。在此又可見牛僧孺刻意運用實有歷史人物敘述與史實不符的事件，展現虛構。而〈郭代公〉敘述主人翁郭元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然根據《（新、舊）唐書·郭元振傳》的記載，郭元振十八舉進士，高宗上元元年已中第，開元元年已去世。〈景生〉故相「呂譚」實為「呂湮」，朔方節度使「張或然」原為「張仁願」。也是同樣的手法。于天池曾特別指出牛僧孺在寫歷史人物傳聞時，有意外誤人名，錯亂其事，這是他故弄狡獪，否認故事事實性的方法，公然標明故事是虛構的。<sup>44</sup>

《玄怪錄》多則敘事涉及的空間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子虛烏有的國度。如前述〈顧總〉具有冥界性質的「坤明國」，雖然《玄怪錄》的文本也以「泰山府君」此一地獄主宰傳說表述死後世界，例如〈劉諷〉、〈董慎〉，而在〈崔環〉中還敘述崔環至地獄陰司，〈南纘〉、〈吳全素〉、〈馬僕射總〉、〈蘇履霜〉、〈景生〉、〈盧頊表姨〉等亦見冥司的敘述，〈李汭〉亦出現出現「無間獄」。雖然有現成的死後世界可以指稱，但《玄怪錄》仍杜撰出前所未見的擬於冥界的國度所在，以「坤明國」名之，強調的是另一國度，其意涵便超越了冥界的意義。此外，《玄怪錄》還想像出理想的國度，即〈張左〉中的「兜玄國」和〈古元之〉的「和神國」。「兜玄國」所在居然在從張左前生薛君胄耳中出來的二童子之耳中，而童子傾耳示薛君胄，薛君胄所見竟「別有天地，花卉繁茂，薨棟連接，清泉翠竹，縈繞香甸。」而薛君胄還進入其中，見一都會「城池樓堞，窮極瑰麗。」二童子又告訴薛君胄兜玄國大小與薛君胄的國家等同，並引領他拜見「蒙玄真伯」。耳中國度令人聯想《莊子·則陽》的蝸角觸、蠻氏之國，但其空間的大小變化和迴環返復，則更為繁複，實是奇想。而由進入兜玄國即可得長生，入而復出則可壽千歲，致使「兜玄國」具有了仙境的指涉。同樣地，在《玄怪錄》中亦見「仙界」描寫，如〈柳歸舜〉、〈崔書生〉、〈劉法師〉等篇描述的仙境。牛僧孺仍以另立國度的方式來表述，同時運用了幻化的方式來勾勒兜玄國的存在，兜玄國自當與仙界有所區別。

《玄怪錄》諸國中最為特殊的就是〈古元之〉的「和神國」，由文本所述，

<sup>43</sup> 《三國志·魏書·王毋丘諸葛鄧鍾傳》注引《博物記》曰：「初，王粲與族兄凱俱避地荊州，劉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凱有風貌，乃以妻凱，凱生業。」〔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臺北：洪氏出版社，1975年），頁796。

<sup>44</sup> 見氏：〈牛僧孺和他的《玄怪錄》〉，《中華文史論叢》第2輯（1986年），頁81-82。

「和神國」是一針對人世生存遭逢的身心困境和痛苦所設想的理想國度，泯除了生命面臨的物質和精神方面所有問題，生活豐饒富裕，人際和樂無爭。唯一保留了死亡，而以百二十歲的壽命和壽盡歿失，親人遺忘，無憂感之傷，來化解人生至痛。由此可知「和神國」雖然是以騎竹杖飛天而至，此一神仙故事常見的情節單元，但「和神國」並非仙界，而是總括人生諸相的理想生活國度。除了「坤明國」、「兜玄國」、「和神國」之外，〈劉諷〉敘事中還出現「諸餘國」，但未加以闡釋。在〈張左〉一則中兜玄國高冠長鬣絳紗衣人宣制，首句便言「肇分大素，國既百億」，表達了對宇宙空間中存在許多國度的想像，然《玄怪錄》諸國，已非《山海經》藉由人的形性特質建立的遠人異國思維，而是摻雜了冥界、仙界、古代理想國所設立的國度。<sup>45</sup>牛僧孺揚棄了承襲既有異於此界的空間，而另造他國，可謂為虛構的表徵，然於這些國度寄寓所思，則更是貼近寓言的本質。這些國度的命名，如「兜玄國」、「和神國」也與《玄怪錄》刻意顯示虛構的人名和書名出於一轍。

唐代小說基本上是以史傳形式書寫，往往表達明確的時空背景，同時也致使事件近於真實，《玄怪錄》中固然有多則文本展現類似的敘述特質，但也出現了可觀的敘事在時空上刻意突顯虛構，其中以設定歷史時間和虛擬空間及兩者間交錯與現實的背離，並虛擬想像的國度皆為非常鮮明的幻設跡證。

### （三）擬人化和諧隱的修辭

從胡應麟討論歷代變異之談的著名論述提及〈元無有〉後，〈元無有〉成為《玄怪錄》的代表作品，而關於此類精怪故事，在《玄怪錄》中尚有多篇，如〈來君綽〉、〈滕庭俊〉、〈岑順〉、〈韋協律兄〉等，這些故事都是植基於六朝以來「物魅成精」的思維，但在敘述上則具有「隱」到「顯」的歷程，其間也運用了「諧隱」的修辭手法，揭示物之原形。即此一由「隱」到「顯」的歷程，就是由「人」還原至「物」的歷程。即在小說文本中精怪出現時是以人的面目現形，當然包括了人的言語和行為，廣義上來說亦是一種擬人化的修辭，但微妙的是在這擬人化描寫的同時，也暗藏著其原形的特徵，換言之，擬人化與諧隱的修辭並進。例如〈元無有〉中元無有見四人談諧吟詠，藉元無有的聽聞，描述他們的形

<sup>45</sup> 王夢鷗指出「和神國」是以《列子》所述「華胥國」為雛形而構設。參見氏：〈牛僧孺的幻想國〉，《唐人小說研究四集》，頁 149-150。

貌和詠詩內容，完成精怪原形的隱語。「其一衣冠長人即先吟曰：『齊紈魯縞如霜雪，寥亮高聲予所發。』」即「故杵」；「黑衣冠短陋人詩曰：『嘉賓良會清夜時，煌煌燈燭我能持。』」為「燈臺」；「故弊黃衣冠人，亦短陋，詩曰：『清冷之泉候朝汲，桑綆相牽常出入。』」是為「水桶」。「故黑衣冠人詩曰：『爨薪貯泉相煎熬，充他口腹我為勞。』」則是「破鑊」。由元無有所見所聞，以直述精怪的外表和詩歌所吟詠的功能，完成影射物怪原形的隱語。而〈滕庭俊〉中名為「麻束禾」老父「鬚髮疎禿，衣服亦弊」，所吟詩歌為：「自與渾家鄰，馨香遂滿身。無關好清淨，又用去灰塵。」隱喻著其實為禿掃帚，至於和且耶所吟詠的「冬朝每去依煙火，春至還歸養子孫。曾向苻王筆端坐，邇來求食渾家門。」詩句，亦是依循蒼蠅習性和相傳蒼蠅洩漏前秦苻堅大赦消息的典故，點出和且耶原形為蒼蠅。〈岑順〉中兩軍交戰，實為象戲，由最終發現墓室「甲冑數百，前有金床戲局，列馬滿秤，皆以金銅成形，其干戈之事備矣。」的盟器來揭曉，原來高數寸的鐵騎飛馳實是象戲，軍師「天馬斜飛度三止，上將橫行係四方，鎗車直入無迴翔，六甲次第不乖行。」之詞是象戲行馬之勢，擬人化的物魅形態由諧隱的方式來作事實的昭示。〈韋協律兄〉中自池中出的身短腳長，顏色頗黑，長可尺餘的小兒，以兩腳行於韋生的腳上，冷於冰鐵，而實為一缺一腳的古鐵鼎子。都是依循著同樣的模式敘述。〈周靜帝〉一則中，「省名部落」諸人分別姓馬、皮、鹿、熊、驢、衛、斑，都取名為「受」，部落主則為「成多受」，由文本後敘而知是諸袋為怪，同名為「受」即暗示諸袋的功能，而以諸動物為姓，則暗示諸袋的材質。「成多受」便是諸袋的統合之稱。

除了上述精怪故事，以擬人和諧隱的修辭以示幻設外，在《玄怪錄》中尚見直接以擬人化修辭敘述者。例如〈柳歸舜〉中柳歸舜泛舟巴陵，遇風被吹至君山，登岸見大石中樹，有鸚鵡數千相呼姓字，還能言談唱歌，如：

有名武遊郎者，有名阿蘇兒者，有名武仙郎者，有名自在先生者，有名踏蓮露者，有名鳳花台者，有名戴蟬兒者，有名多花子者，或有唱歌者曰：「曲子是漢武鉤弋夫人所唱：『戴蟬兒，分明傳與君王語，建章殿裡未得歸，朱箔金缸雙鳳舞。』」名阿蘇兒者曰：「我憶阿嬌深宮下淚時，唱曰：『昔請司馬郎，為作〈長門賦〉，徒使費百金，君王終不顧。』」又有誦司馬相如〈大人賦〉者曰：「吾初學賦時，為趙昭儀抽七寶釵橫鞭，余痛實不徹，今日誦得，還是終身一藝。」名武遊郎者言：「余昔見漢武帝，



乘鬱金轂，泛積翠池，自吹縹玉笛，音韻朗暢，帝意歡適。李夫人歌以隨，歌曰：『顧鄙賤，奉恩思；願吾君，萬歲期。』」

雖然鸚鵡自稱為禽鳥，不能致力生人，請桂家三十娘子招待柳歸舜。但礙於黃郎不在，三十娘子還是請青衣阿春召喚鸚鵡鳳花台來接待，於是鳳花台便和柳歸舜論詩，鳳花台將其過蓬萊玉樓作詩展示給柳歸舜：「露接朝陽生，海波翻水晶，玉樓瞰寥廓，天地相照明。此時下樓止，投跡依舊楹。顧余復何忝，日待群仙行。」柳歸舜以「麗則麗矣」作評，並詢問鳳花台所師何人，鳳花台的回答為：「僕在王母左右千餘歲，杜蘭香教我真籙，東方朔授我秘訣。漢武帝求太中大夫，遂在石渠署見揚雄、王褒等賦頌，始曉箴論。王莽之亂，方得還吳，後為朱然所得，轉遺陸遜，復見機、雲制作，方學綴篇什。機、雲被戮，便至於此。殊不知近日誰為宗師？」歸舜回言：「薛道衡、江總也」因誦數篇示之，鳳花台則評論：「近代非不靡麗，殊少骨氣。」通篇可謂為柳歸舜與眾鸚鵡的互動，鸚鵡雖然未以人形現身，但卻有名字和具種種人之樣態，煞有介事的吟詠、論詩，完全是擬人化的修辭表現。

〈蕭志忠〉一則中敘述晉州刺史要臘日畋獵，因暴瘡而止於巖穴的的薪者則趁著山月看「有一人身長丈餘，鼻有三角，體被豹鞞，目閃閃如電，向谷長嘯。俄有虎、兕、鹿、豕、狐、兔、雉、雁駢百許步」。原來此人是玄冥使者，奉北帝之命告知群獸明晨臘日蕭志忠畋獵，群獸中若干合鷹死，若干合箭。群獸恐懼，而有老虎和老麋則屈膝向使者求告，說出「以某之命，死亦以分。然蕭公仁者，非意欲害物，以行時令耳，若有少故則止。使者豈無術救余？」之言。又玄冥使者回復己之任務只在奉帝命宣示群獸刑名，要群獸自力救濟，同時還建議了群獸去祈求善謀的東谷嚴四，群獸得知可能有救，遂「輪轉歡叫」。既至東谷，嚴四提到蕭志忠役人，特別體恤飢寒，建議群獸祈求滕六降雪，巽二起風，蕭刺史就不會畋獵了；蕭四還進一步地指引祈求的方法，因滕六喪偶，新進歌姬又以妒忌罷黜，若得美女便會立刻降雪，巽二好飲，得醇醪則風立生。於是有二狐自稱：「多媚，能取之。河東縣尉崔知之第三妹，美淑嬌豔。絳州盧思由善釀醪，妻產，必有美酒」，於是諸獸有歡聲。可見群獸已經擬人化了。群獸擬人哀求，故事中的動物在形體上仍保留了動物的原貌，卻具有人的舉措行為與人類互動。與西方寓言以動物擬人化的敘事相仿，當然也令人設想到柳宗元〈蝘蝓傳〉、〈黔之驢〉。而文本中的滕六和巽二，由二者分別負責「降雪」和「起風」而觀，則是運用《韓

詩外傳》：「雪花獨六出」<sup>46</sup>和《易·說卦》：「巽為木，為風」<sup>47</sup>的典故，明顯暗示一為雪、一為風，<sup>48</sup>也是諧隱和擬人手法的交互使用。文本中對東谷巖四此一角色形貌、言語、詩文的陳述，亦不脫此修辭手法。

然六朝已見以服色或體態特徵暗示精怪原形，而後再揭示真相由隱到顯的文本敘事，但《玄怪錄》在此敘事特色上展現地更加生細膩，尤其以詩為諧隱媒介，正反應了唐代詩歌發展的繁盛。李鵬飛在談論認為這樣的敘述暗藏著記錄者或敘述者的用心，因為就其本質而言，這樣的故事是不可能在生活中發生過，而是被人想像或講述出來。<sup>49</sup>換言之，這樣的敘事很明顯是一幻設的結果，《玄怪錄》則在更深化的精怪諧隱敘事中，加強了幻設的程度。至於〈柳歸舜〉一則中的鸚鵡近似於仙境的鳥禽，其原型為《山海經》的為西王母取食的三青鳥，衍至漢代以後有關漢武帝故事中神仙女子或以青鳥之姿或著青衣出現，可以從神仙身形的變化視之，<sup>50</sup>一如〈袁洪兒誇郎〉中翠翠鳥自謂「化身遊行」，然〈柳歸舜〉中一直以鸚鵡之身形言行，從敘事的文體特質來思考，更近於動物的擬人化，則可說是寓言的表達方式，虛構的性質更為彰顯。

#### （四）以「志怪」題材為撰作憑藉

就今所見《玄怪錄》的內容大致可分為神仙、精怪、人鬼交涉、冥界遊歷、命數、異國等主題，而這些都不出六朝志怪的題材，甚至王夢鷗還一一指陳，故事文本與六朝志怪的承繼關係，<sup>51</sup>綜觀全書文本，〈崔尚〉幾乎複製了《搜神記》所記〈阮瞻〉故事，只不過置換了人物；至於在〈周靜帝〉中精怪伶人相互吞吐，進而吞吐居延部落主勃都骨低兒女弟妹甥姪妻妾等，此一情節與《續齊諧記》的陽羨書生和《靈鬼志》的外國道士所施法術雷同，可謂為西域幻術的展現，〈侯

<sup>46</sup> 《太平御覽》卷十二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雪花曰霰。」〔宋〕李昉等編，夏劍欽、王巽齋校點：《太平御覽》（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105。

<sup>47</sup> 〔魏〕王弼著，樓宇烈校釋：《周易注》，頁383。

<sup>48</sup> 「騰六」和「巽二」掌降雪和起風，以民間信仰的角度而言，可謂雪神和風神，就不必以擬人化的敘事手法視之，但由文本中騰六寫信、喪偶、求索美女，巽二好飲等人性描寫。則可作此思考。

<sup>49</sup> 見氏：《唐代非寫實小說之類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52。

<sup>50</sup> 詳見拙著：《六朝小說變形觀》（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14年），頁69-83。

<sup>51</sup> 見氏：《〈玄怪錄〉及其後繼作品辨略》，《唐人小說研究四集》，頁7-14。

通》中老翁盡取侯通妓妾十餘人投入所負之笈，亦是援引同一法術。至於〈元無有〉等精怪系列故事，脫化自《列異傳》的細腰故事。六朝志怪常出現的物魅惑人、進入仙境、冥界遊歷等情節，亦是《玄怪錄》常見的敘述題材。但值得注意的是，《玄怪錄》並非僅承繼志怪題材，往往在所承自的「志怪」情節之外，添加了其他的內容，例如〈元無有〉、〈滕庭俊〉、〈來君綽〉等出現了人與精怪宴飲賦詩行酒令的敘述，即顯示故事文本的內容意涵已逾越了六朝志怪故事。〈郭代公〉一則是為六朝物魅淫惑情節的運用，卻表達郭元振為民除害之仁勇和事已前定，即使處於窮迫之境，鬼神終不能害的命定思維。〈華山客〉一轉六朝志怪美艷狐精魅惑男子進行枕席之歡的情節，而為求黨超元助其成仙。又〈張左〉、〈劉法師〉等有關仙境刻劃文本，都寓含了主人翁仙／凡抉擇的辨證。冥界遊歷諸則隱然與現世的制度相涉，如〈董慎〉則是泰山府君召喚人間良官和辭采雋拔的秀才至冥間秉公判案，轉化了地獄作為死後歸趨的文化信仰意涵，換言之，僅為幻境，已然失去其作為一死後空間的主體性。

《四庫提要》曾以「志怪」指稱《玄怪錄》和《續玄怪錄》二書，<sup>52</sup>但畢竟二書已經與之前的志怪小說不同。程毅中提出《玄怪錄》的題材是志怪故事，但卻注意語言的提煉和細節的鋪敘，特別是在怪異的情節中加強了人物形象的描寫，開拓了志怪小說的新階段。<sup>53</sup>這是極為精確的觀察，不過還是將全書定位在「志怪小說」上，僅就敘事手法的精進提出觀察所得，然對於因為敘事手法和情節內容的改變所導致的主題指涉差異，則未見隻字。就《玄怪錄》有些文本在志怪小說題材拓展出新的情節內容而觀，應是胡應麟所說的「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的敘事表現，而與六朝「志怪」主要在記奇述異的撰作之旨有了區隔。因此在這樣的文本中出現的志怪情節，實成為作者意圖傳達某些思維的憑藉，即是以「志怪」情節為托寓。一如沈既濟以《幽明錄·楊林》為梗概，演繹為〈枕中記〉，轉化原作記述奇異的思維，而表達出一己對人生仕進的觀點。故《國史補》言：「既濟撰《枕中記》，莊生寓言之類。」<sup>54</sup>將之定位為「寓言」。而此寓有作者作

<sup>52</sup> 《四庫全書》小說家存目（二）收有《幽怪錄》一卷，附《續幽怪錄》一卷，《提要》敘述《玄怪錄》只存一卷，殆鈔合而成，並非舊本，《續玄怪錄》僅剩殘篇數頁，而不成卷，然認為「志怪之書，無關風教，其完否易不必深考也。」〔清〕永瑤等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3冊，頁1042-1043。

<sup>53</sup> 見氏：《唐代小說史》，頁194。

<sup>54</sup> 〔唐〕李肇著，曹中孚校點：《唐國史補》，《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

意的神異敘事，實不同於「志怪」。魯迅以「傳奇」目之，故《玄怪錄》被其定位為「傳奇集」，這樣的定位，就是著眼於《玄怪錄》文本，已不以述異為撰作目的。<sup>55</sup>

《玄怪錄》以「志怪」題材為作意施展的憑藉，特別可以從一篇之中並陳的「志怪」題材看出，即文本不是針對單一的奇異事件敘述，而是同時涉及了不同的志怪主題，例如〈張左〉一篇中包括了占夢、長生、轉世、異國等多元的「志怪」題材，而開展出文才的流露、理想國度的構設和奇思巧趣的營造等繁複的意涵。〈蕭志忠〉則拼合了命數、神仙、變形、神祇等志怪題材，營造了展現文才和批判主事收賄的詮釋空間。〈華山客〉則融合了物魅、神仙、命數等元素，製造出種種出人意表的趣味和意義。

以上就今可見的《玄怪錄》文本在敘事上顯露的幻設跡證作了詳細的指陳，在小說人物的命名上刻意故弄玄虛，以示全篇的虛構性，而在小說的背景上，則選擇不示時代，或託古言事並錯亂時空，甚至虛擬國度來表達，令人即知其出於造作，而諧隱和擬人修辭，與現代寓言的敘事手法同步，其虛構性不言而喻，而運用、揉合六朝志怪題材，拓展敘事的內容，在述異之外，別具寓意，亦為幻設的表現。

### 三、《玄怪錄》文本顯示幻設跡證的作意

《玄怪錄》的一些文本確實可見牛僧孺自見構想之幻，顯露詭設的跡證，然而牛僧孺為何選擇這樣與力求與信實相違的敘事策略，關於此一議題，前人對全書的評價，如〈周秦行紀論〉提出的「多造隱語」、洪邁所說的「寓言」，胡應麟「好奇語誕」、「作意好奇」、「文士寓談」、「假稱神怪以自發其詞」等評論，雖然粗略浮泛，然已流露了詮釋的端倪，大致可以援用胡應麟所提出的「好奇語誕」和「文士寓談」為思索的兩端，一是純粹出於對奇誕的興味，故刻意虛構示幻；一是藉由顯示幻設，來表達實別有所圖。事實上現當代的學者，對此則有較為詳細的思考，進而提出主張。例如林文寶認為《玄怪錄》記述的是志怪事，

版社，2000年），頁193。

<sup>55</sup> 李劍國認為《玄怪錄》是「志怪傳奇集」，見氏：《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頁786。殆判斷全書中仍見有記述怪異者。

看不出與現實社會有何關係，並非是有所規諷而作，所以可說是牛僧孺好怪異的遣興之作。<sup>56</sup>李宗為指出《玄怪錄》純粹是假虛幻的神怪故來顯露才華，具有「不寓懲戒，假小說以寄藻思」的特點。<sup>57</sup>李劍國亦認為全書「不常寄寓規戒，其基本格調是對興趣——生活情趣、諧趣、奇趣、文趣——的追求」。<sup>58</sup>富永一登將《玄怪錄》的內容以《廣記》目錄檢視，認為其內容是各式各樣的，不認為《玄怪錄》的文本傳達了某種思想；或各設有特定的主題，甚至是為注入某種寓意而創作。<sup>59</sup>上述學者較傾向於《玄怪錄》是純粹的好奇語誕之作，藉神怪故事追求奇譚趣味，同時展露文章才華。此一詮釋面向似乎無法關照「寓言」、「文士寓談」和「假稱神怪以自發其詞」等評論。王夢鷗則肯認《玄怪錄》有不同的撰作旨趣，有純為錄奇志怪者、托故談諧以示文才者、不滿現實暗刺時事者、企慕仙術幻想世外與信任夙命者。甚至還明確地指出《玄怪錄》中似有寓意的文本。<sup>60</sup>王夢鷗對於《玄怪錄》的撰作意旨，有較為廣闊的觀照，也更為切合歷來對《玄怪錄》所作的評價，惜未加以深入闡釋。以下試從好奇語誕、以示文才、寄寓等面向，探求牛僧孺於文本中顯示幻設的用意。

### （一）好奇語誕

《玄怪錄》中出現文末故事所來自的後設敘述，固然有取信於人的意涵，但同時也是唐代小說「徵異話奇」的傳述特質展現，<sup>61</sup>講述、聽聞和撰作都顯示出對

<sup>56</sup> 見氏：〈牛僧孺與《玄怪錄》〉，收錄於柯慶明、林明德主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小說之部（二）》（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77年），頁62。

<sup>57</sup> 見氏：《唐人傳奇》，頁49。

<sup>58</sup> 見氏：《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頁52。

<sup>59</sup> 富永一登著，盧秀滿譯：〈唐代小說之創意外圖——以〈杜子春〉為中心〉，頁128-129。

<sup>60</sup> 見氏著，〈《玄怪錄》及其後繼作品辨略〉，頁22-24，頁60-67。王夢鷗認為牛僧孺託言神怪，往往於其中寄遇，曾舉《玄怪錄》有寓意的文本，包括〈張老〉、〈顧總〉、〈董慎〉、〈蕭志忠〉、〈南蠻〉、〈侯適〉、〈掠剩使〉、〈王煌〉、〈杜亞〉、〈崔尚〉諸篇。其中〈張老〉實為《續玄怪錄》篇目。

<sup>61</sup> 李時人認為唐代言言小說的創作多經歷了「晝宴夜話，各徵其異說」到「握管濡翰，疏而存之」的過程。證明唐代士子宴聚交遊，除了詩酒唱和外，還有「徵異話奇」的內容，而此「晝宴夜話」往往造成大量的奇異故事產生、流傳、擴散，有些則著成小說。詳見李時人為俞鋼《唐代言言小說與科舉制度》所作之〈序言〉，俞鋼亦認為唐代士人「徵異話奇」的風尚對唐代言言小說的題材選取，產生很大的影響。分見氏：《唐代言言小

奇誕之事的興味，值得注意的是〈張左〉在故事起始便敘述：「前進士張左，嘗為叔父言」，又〈李汭〉和〈南纘〉二則之始亦為「漢中從事李汭言」、「廣漢守南纘，嘗為人言」，開宗明義地表達直接來自故事主人翁的轉述或轉載他人所述事件，都傳達出牛僧孺對神奇怪誕事件的注目，汪辟疆以〈元無有〉一篇所敘極為「怪誕」，來突顯牛僧孺的「嗜奇」。<sup>62</sup>然而在《玄怪錄》中有一系列的奇誕故事，雖屬志怪的內容，但無涉於與六朝志怪小說的承繼關係，同時故事皆刻意模糊發生時間或時間背景歸屬於前代者，這些故事可以說是奇特想像的結果，更為強烈地傳達出牛僧孺對奇誕的嗜好。〈巴邛人〉一則中輕重如常橘的兩大橘子中，剖開竟有四位尺餘老叟相對象戲。而賭資竟是種種奇特的仙物，而一隻削食龍根草，食訖，以水喂之而化為一龍，四叟共乘，足下雲起，頓時在風雨晦冥中，不知所往。固然在此文本中出現商山、智瓊、絳臺山、瀛州等關涉神仙的文化符碼，但是全篇除了奇、趣，幾乎無其他意義可尋。〈刁俊朝〉中刁俊朝妻子巴嫗項上長瘻，初若雞卵漸巨如三四升瓶盎，四五年後如數斛之囊，致使巴嫗不能行動，其中還有合於音律的樂器聲響，幾年後，瘻外生出幾億個如針芒的小穴，天要下雨時，穴中吐出白雲。全家大小都很害怕，主張送巴嫗到巖穴中，只有刁俊朝不捨，但甚難違背眾議，巴嫗遂要刁俊朝拆瘻，俊朝以利刃拆之，原來其中是一老獼猴精，素與漢江鬼愁潭老蛟解致風雨覆來往舟船，取舟中餽糧以養孫息，而太一誅蛟，搜索黨與，所以才借住在巴嫗的頸項上，獼猴精向鳳凰山神求得靈膏讓巴嫗塗上，果然立即癒合。俊朝因此留猴精，設食款待，猴精高歌，又為絲匏瓊玉之音，後辭去不知所終。此則故事涉及了精怪、神祇，雖然覆舟船以取糧食，遭受太一搜索，但最終未給予猴精懲處，完成善惡的因果報應，反而強調的是獼猴精的神異。牛僧孺特別喜歡以空間幻化表現神奇異趣，如常橘中有二叟（〈巴邛人〉），項瘻中有大獼（〈刁朝俊〉），十餘人投於笈中卻不覺笈中之窄（〈侯暹〉），一人可以吞吐多人（〈周靜帝〉），耳中可以藏納一個國度（〈張左〉），可以割下耳中肉為耳置於額上與其他二耳貫通（〈董慎〉）等。其中多以人體作為幻化的載體，顛覆正常的空間概念，充滿想像的奇思。

無論是轉載記述或虛構想像，都說明了牛僧孺「好奇語誕」的撰作傾向，除

說與科舉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序言〉頁13、頁338-353。

<sup>62</sup> 汪辟疆云：「篇中所敘，本極怪誕，牛相嗜奇，一至於此。」見氏：《唐人小說》，頁198。

了文士之間「徵異話奇」外，亦與元和年間文學「尚奇」的文風息息相關。<sup>63</sup>李珣的〈故丞相太子少師贈太尉牛公神道碑〉說韓、牛二人為「文章友」，<sup>64</sup>又《唐摭言》記述牛僧孺始舉進士之際，以所業謁韓愈，可見他曾遊於韓愈之門。<sup>65</sup>王夢鷗就牛僧孺現今遺文，詳加省視，認為他的用詞造語，與韓愈文章為近，又在討論〈古元之〉一篇時，認為文本中托以「筆公」為稱的古弼來敘述，實受韓愈〈毛穎傳〉影響。韓愈奇詭的寫作風格，自然可由「文章友」的關係渲染及牛僧孺的作品。<sup>66</sup>然將〈古元之〉的撰作與〈毛穎傳〉相連結，則意味牛僧孺在奇誕風格的崇尚之外，還有其他的撰作目的。

<sup>63</sup> 于天池指出牛僧孺描寫物魅大多為故杵、破鑊、大蟪、蒼蠅、禿帶等醜類，呈現出一種黑、怪、醜、奇的風趣，這一方面顯示了牛僧孺個人的審美趣味，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中晚唐詩壇追求險怪奇崛的風氣。見氏：〈牛僧孺和他的《玄怪錄》〉，《中華文史論叢》第2輯（1986年），頁80。

<sup>64</sup> 李珣〈故丞相太子少師贈太尉牛公神道碑〉云：「早與韓吏部、皇甫郎中為文章友，其名相上下，晚與白少傅、劉尚書為詩酒侶，其韻無高卑。」〔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臺北：華文書局，1965年），卷888，頁5574。

<sup>65</sup> 《唐摭言》卷六：「韓文公、皇甫湜，貞元中名價籍甚，亦一代之龍門也。奇章公始來自江黃間，置書囊於國東門，攜所業，先詣二公卜進退。偶屬二公，從容皆謁之，各袖一軸面贊。其首篇〈說樂〉。韓始見題而掩卷問之曰：『且以拍板為什麼？』僧孺曰：『樂句。』二公因大賞之。問所止，僧孺曰：『某始出山隨計，進退惟公命，故未敢入國門。』答曰：『吾子之文，不止一第，當垂名耳。』因命於客戶坊僦一室而居。俟其他適，二公訪之，因大署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幾官先輩，不遇。』翌日，自遺闕而下，觀者如堵，咸投刺先謁之。由是僧孺之名，大振天下。」〔五代〕王定保撰，陽羨生校點：《唐摭言》，《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1626-1627。林文寶認為此段記述不符史實，牛僧孺中進士是在德宗貞元21年（805），韓愈此時在江陵為法曹參軍，不在京城，直至憲宗元和元年（806）才召為國子博士。而皇甫湜是元和元年進士，比牛僧孺晚。認為此出於《太平廣記》卷180的記載不實。而另一《唐摭言》的異文：「韓愈、皇甫湜一代之龍門也。牛僧孺攜所業謁之，其首篇〈說樂〉。韓始見題即掩卷問曰：『且以拍板為什麼？』僧孺曰：『樂句。』二公大稱賞，俟他適訪之，大書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翌日，遺闕以下咸往投刺，因此名振。」較為可信，即牛僧孺往見韓愈、皇甫湜，是以文會友，而並非溫卷。見氏：〈牛僧孺與《玄怪錄》〉，頁51-54。

<sup>66</sup> 見氏：〈牛僧孺的幻想國〉，《唐人小說研究四集》，頁157-158。

## （二）以示文才

牛僧孺在文本中自見構想之幻，顯露詭設之跡，不僅是出於「好奇語誕」的崇尚，汪辟疆先生曾言「唐時文士，往往假小說以寄藻思」，<sup>67</sup>李宗為也持相同觀點，李劍國則特別強調《玄怪錄》的文趣。牛僧孺幻設為文的一個很重要的目的是營造可以馳騁才思的空間，表現一己撰作詩文的才華。

在〈董慎〉中敘述太山府君因處理令狐寔因與太元夫人為親屬，因而減輕罪責，導致罪人程翥等人引例喧訟，太山府君申報天曹，天曹認為罰疑唯輕，令太山府君量減二等，太山府君恐後人援引判例，遂請「性公直，明法理」的兗州佐史董慎至太山擔任錄事，董慎認為天地刑法，不宜恩貸姦慝，但表明一己僅為一胥吏，素無文字功力表達，推薦「辭彩雋拔」的常州府秀才張審通。這樣的情節設計就是要凸顯文才的重要。事實上從黃衣使者告訴董慎太山府君要他擔任錄事，而出示的牒文，到張審通首次所寫判辭，引發天曹回覆譴責太山府君的天符，以致張審通又再申訴的判辭，最終又有天符來覆，認為申訴允當。文本中一一載記了這些牒文、判辭和天符的內容，即是牛僧孺文才的展示。文本架構在冥界遊歷的志怪題材之上，但卻在情節上刻意營造出書寫文辭的空間，敘述的重點已非冥界的刻劃。

〈顧總〉一則中王粲、徐幹給顧總前生劉楨的集子，其中有一首〈從駕遊幽麗宮卻憶平生西園文會因寄修文府正郎蔡伯喈〉，在文本中完整記載。而文本中王粲自言娶劉表女生子之事，就情節發展而言，非常唐突，且王粲父子的對話亦與顧總無關，但文本卻一字不漏記述，就是要將言語的慧點展露。此外，王粲由自己孩子的事，帶出顧總前生之女嬌羞娘所寫思念父親的詩歌，顧總亦回覆一首憶兒詩。很明顯地，全篇文本著重在詩歌、言語的表現，而此表現是植基在此界與他界的空間區隔讓歷史人物交會的幻設手法。同樣以此手法表現文才的還有〈袁洪兒誇郎〉，文本中以幽明兩界的人鬼遇合，交錯六朝晉、陳人物吟詠詩文，故事敘述誇郎在野外羅得一翠翠鳥，在清夜月明之際，徹燭長吟：「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忽失翠翠鳥所在，卻見一雙鬟婢女立在其左。由其自我介紹：「某王家二十七郎子從嫁，本名翡翠，偶因化身遊行，使為袁郎子羅得。」可知翠翠鳥為翡翠所化。翡翠稱說誇郎的詩歌佳妙，但卻提到了王家的二十七郎封郎：「能押劇韻，又為三言四言句詩，一句開口，一句合口，詠春詩曰：『花落也，蛺蝶

<sup>67</sup> 見氏：《唐人小說》，頁195。



舞，人何多疾，吁足憂苦。」如劇韻押法之詩，有一二百首。」誇郎遂邀封郎來訪，二人甚為相得，次日，封郎邀誇郎至所贅岳家一會，並介紹主人家的王氏兄弟，進而介紹妻之姨與誇郎為妻，在親迎之日，誇郎下筆賦詩：「好花本自有春暉，不偶紅妝亂玉姿，若用何郎面上粉，任將多少借光儀。」誇郎篇詠甚多，如又有詠花扇詩：「圓扇畫方新，金花照錦茵，那言燈下見，更值月中人。」而誇郎妻亦有贈袁郎詩：「人家女美大須愁，往往醜郎門外求。昨日金剛腳下見，今朝何得此閒遊？」而後封郎鼓琴，誇郎又賦：「寶匣開玉琴，高梧追煩暑。商絃一以發，白雲飄然舉。何必蒼梧東，激琴懷怨浦。」詩歌的吟詠遍見於文本之中。

〈劉諷〉亦是敘述文明年竟陵掾劉諷，夜投夷陵空館，見七位女郎和一孩兒設酒於庭聚會，趁月彈琴詠詩，聚會中傳翠簪行酒令，一令為「鸞腦好，頭腦好，好頭腦鸞老」，而此令傳說數巡，傳至一口吃女郎紫綬處，但稱「鸞鸞」，為眾人笑。而有人說出隋朝大將賀若弼嘲弄長孫鸞侍郎，年老口吃又無髮，所以造出此令。三更後眾人齊唱迭和三首酒令和詩歌成為敘事的重心。而〈來君綽〉中亦出現了酒令「羅李，羅來李，羅李羅來，羅李羅李來。」亦是在顛倒史實和精怪諧隱、擬人修辭的幻設手法下展現。〈元無有〉和〈滕庭俊〉皆出現精怪自述生平的詩歌，一如前所述，也是擬人和諧隱的修辭。〈岑順〉亦是同樣的幻設手法，於文本中記載金象將軍的檄文和軍師的詩歌。這樣的敘述充分顯示出並非僅在凸顯所述的奇異，而是要將作者的文才展現出來。好比〈蕭志忠〉故事並非止於擬人化和法術的奇趣，當嚴四為群獸提出救命之方後，便向玄冥使者自述胸懷，感嘆昔在仙都，卻千年為獸身，悵悵不得志，為述懷詩一首「昔為仙子今為虎，流落陰崖足風雨，更將斑毳被余身，千載空山萬般苦」，原來嚴四是謫降的仙人，並以老虎之形居於山谷，此詩解釋了群獸來東谷時所見：「有茅堂數間，黃冠一人，架懸虎皮」。但嚴四譴謫之期將屆滿，十一日後回歸紫府，久居山谷將別，充滿離情，遂提書北壁，使後人知曾居於此。書云：「下玄八千億甲子，丹飛先生嚴含質，謫下中天被班革。六千甲子血食潤飲，廁猿穴，下濁界，景雲元祀升太一。」有詩有文。而〈張左〉一篇中申宗的夢辭、兜玄國的制文，以及張左在兜玄國的思歸之詩。亦是各種文章並陳。

《玄怪錄》不僅以各式文類置入小說文本來展現文才，同時還善用文字的特質來展現巧思，如〈元無有〉和〈滕庭俊〉中自寓詩歌與精怪原形的關連。〈董慎〉中當黃衣使者以左曹布囊納董慎到達太山時，忽聞「范慎追董慎到」之聲，太山府君對此而大笑云：「使一范慎追一董慎，取左曹布囊盛一右曹錄事，

可謂能防慎矣！」至此而知董慎之名和黃衣使者名為「范慎」，都有作意，在文詞上形成「范慎」和「董慎」的對應，而下文的「左曹布囊」和「右曹錄事」也形成一對照。從此也可看出在修辭趣味上的講究。但「董慎」、「范慎」之名，似乎也寄寓了「董慎」慎於法理、「楊慎」慎於行事，顯示在文辭的趣味中，亦有寓意。

至於唐代小說常見的議論，《玄怪錄》亦有所展現。〈韋氏〉、〈吳全素〉、〈岑曦〉都可見敘述者對故事的評議，但亦見有藉人物議論者，如〈柳歸舜〉一則很明顯將故事時間設定在「隋」，復以擬人化的方式讓眾鸚鵡賦詩，評詩，皆可謂為作者的代言，既現詩藝，復呈己見。〈郭代公〉中郭代公回應鄉老所言「夫神，承天而為鎮也，不若諸侯受命於天子而疆理天下乎？……使諸侯漁色於中國，天子不怒乎？殘虐餘人，天子不伐乎？」等，亦是一番理論，而以天子／諸侯的關係來比喻天／鎮神，以取得剷除烏將軍的正當性，同時也令人其間存有寓意的設想。〈掠剩史〉一篇中裴璞發表了篇幅甚長的議論來回應韋元方的對掠剩的疑問：「當數而得，一一有成，數外之財，為吾所運，或令虛耗，或累橫事，或買賣不及常價，殊不關身爾。始吾之生也，常謂商勤得財，農勤得穀，士勤得祿，只歎其不勤而不得也。夫覆舟之商，旱歲之農，履空之士，豈不勤乎？而今乃知勤者德之基，學者善之本，德之為善，乃理身之道耳，亦未足以邀財而求祿也。」將命、德作一區分，善敘其理，才思畢現。雖然此一議論不是附於故事之末而是出自於敘述者的論議，卻明顯地見出作者假人物而抒論，而從議論的內容而觀，李宗為認為《玄怪錄》中不附戒勸的議論之說，則有待商榷。

宋人趙彥衛視《玄怪錄》為牛僧孺的投卷之作，故以「文備眾體」的敘事展現他的史才、詩筆和議論。<sup>68</sup>王夢鷗認為《玄怪錄》為牛僧孺早年著述，以及第與否分論全書，當其未第之時，欲炫文才，故多作趣談以充行卷，既第之後，濩落卑僚，多有感觸，託詞前古，寄寓諷刺。<sup>69</sup>並指出〈崔書生〉、〈曹惠〉、〈滕庭俊〉、〈元無有〉、〈周靜帝〉、〈張左〉、〈南蠻〉、〈刁俊朝〉、〈盧公渙〉、〈鄭望〉、〈元載〉、〈魏朋〉、〈韋協律兄〉、〈狐誦通天經〉諸篇為「寫異聞奇事，從而討論詩文，顯示詩才史筆議論之文，以充行卷者。……較少奧義」，

<sup>68</sup> 「唐之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踰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也。蓋此等文備眾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

〔宋〕趙彥衛著：《雲麓漫鈔》（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4），頁222。

<sup>69</sup> 見氏：《〈玄怪錄〉及其後繼作品辨略》，《唐人小說研究四集》，頁46。

<sup>70</sup>然《玄怪錄》為科舉溫卷而作的觀點，已被學界質疑。<sup>71</sup>同時《玄怪錄》全書撰作的時間，目前仍無法確實斷定，<sup>72</sup>王夢鷗列舉所謂行卷文本者，也並非全無奧義，如〈崔書生〉和〈張左〉蘊有仙凡的辨證，〈元載〉一則寓有仕途起落之慨，而〈柳歸舜〉、〈來君綽〉、〈顧總〉、〈劉諷〉等，亦多見詩詞文采，卻未被視為行卷之作。由此可見，王夢鷗的說法也無法成為定論。但趙彥衛所觀察到《玄怪錄》的諸篇的文體特質，卻相當中肯，王夢鷗指出其「欲炫文才」亦為的論。可以確定的是，牛僧孺於文本中所顯露詭設之跡的用意之一，即在展現他的才思，以虛構故事情節馳騁一己之才，不僅追求文章詞藻的體現，甚至在其中寄寓思理。

### （三）寄寓思理

牛僧孺詭設故事實寓有他對人生本質的思考和現實社會的關懷。關於前者，主要涉及的是命定的思維、成仙的可能和理想國度的嚮往等議題，至於後者則與其仕宦經歷相關。

<sup>70</sup> 同前註，頁 24。

<sup>71</sup> 詳見拙著：〈唐代小說「文備眾體」之研究——以趙彥衛的「文備眾體」說及其指涉的相關議題為主〉，《唐代文學研究》第 14 輯（2012 年 7 月），頁 660-678。

<sup>72</sup> 程毅中指出趙彥衛《雲麓漫鈔》的說法，意味《玄怪錄》是牛僧孺早年作品，汪辟疆和程千凡都認為是牛僧孺未通籍以前所作。分見《唐人小說》，頁 195、《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頁 84。而晁公武云：「僧孺為宰相，有聞於世，而著此等書，〈周秦行紀〉之謗，蓋有以致之也。」見〔南宋〕晁公武著：《郡齋讀書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頁 551。則視《玄怪錄》為晚年之作。程毅中認為牛僧孺自大和六年擔任淮南節度副大使後，不太可能有興趣從事小說的寫作，但《玄怪錄》中有一些時代較晚的故事，最晚的一篇是〈黨氏女〉，結尾有「大和壬子歲通王府功曹趙遵約言」，應作於大和六年以後，有可能是《續玄怪錄》混入的。但《玄怪錄》中還有不少故事發生元和、長慶年間，還有大和年間的故事，也不能將涉及年代較晚的作品，都解釋成混入的續作。《玄怪錄》的寫作年代還有待進一步討論。尤其作於牛僧孺未通籍之前的說法，有必要重新討論。見〔唐〕牛僧孺撰，李復言撰，程毅中點校：《玄怪錄續玄怪錄》，「前言」，頁 7-8。《玄怪錄》的撰作應該持續是一段時間才完成，王夢鷗的推測由未第到既第居下位時，有其道理，但是否可以劃分如此整飭的兩階段，還有未第之前所作是為行卷，仍有待商榷。于天池分析牛僧孺的生平和《玄怪錄》的內容，認為《玄怪錄》是牛僧孺長期創作積累而成，特別是元和年間和大和六年到開成三年任淮南節度使和留守東都的時期。詳見氏：〈牛僧孺和他的《玄怪錄》〉，頁 72-77。

### 1. 命定的思維

《玄怪錄》中〈韋氏〉一則完全是命定思維的體現，文本中藉由韋氏婚配事，引發韋氏向其母述出及笄之年所夢預示韋氏一生所遇，包括婚姻對象、丈夫官場際遇、丈夫伏法死亡、韋氏與媳婦入掖庭蔬食而役、蒙詔放出後回到故居，九年後從化而去。而後文本便一一敘述韋氏如夢所示遭遇。以夢與現實雙重的敘事傳達「人之榮悴，無非前定」的主題，甚至夢中如何出宮闕以至回到故居的場景敘述比真實所遇還要詳細，似乎更為突顯出一切早已注定的思維。而〈郭代公〉一則除豬妖之害的故事，最終還演繹出被救女子拜從郭代公，被納為側室，生子數人，而以「公之貴也，皆任大官之位。事已前定，雖生遠地而棄焉，鬼神終不能害，明矣。」的命定議論為故事主題定調。《玄怪錄》許多小說文本也出現陰冥限數的思維，例如〈岑曦〉中岑氏祖先為岑曦求恕，也無法讓岑曦免於伏法籍沒的遭遇，牛僧孺甚至在事件之末議論：「僕常聞人之榮辱，皆稟自陰靈。惟此鬼吏，其何神速矣。乃知幽晦之內，其可忽之乎！」隱然將人生的生死榮辱遭遇歸於陰司，輾轉地表達了命定的觀點。〈馬僕射總〉一篇中因杜佑推薦馬總接替自己擔任陰司都統一職，而成為天命，即使馬總抗拒，也是徒勞，文末所述「明年罷鎮還京，及夏而薨，斯乃果從所請乎？公之將薨也，有兗人逢甲兵萬騎擁公東去者，得非赴是職歟？」則是一印證陰司限命觀點的敘述。其他如〈蘇履雙〉至冥司見舍利王，舍利王所預言太原節度使馬侍中兩年罷節度使之職，所以一年之內入赴朝廷，以及馬侍中之子將早棄人世，而身兼冥司判官的王鳳翔也知此預示，根據史書所載馬燧被罷節事蹟和其長子馬匯未壽終有後而觀，此則敘事正是以命定來觀照馬燧的際遇。即藉冥界陰司對於陽世之人的遭遇預知，來呈現命定的觀點。〈景生〉中景生命數未至而被故友勾留冥間，被放回之際，受朔方節度使張或然之託，叮囑其在人間二子曾子和夫子，請曾子不要起屋以妨曾子新婦，又預告二子之官仕，曾子當終刺使，夫子亦為刺使而不正拜，後果如其言。全篇主旨與〈蘇履雙〉相近，皆傳達了人生際遇，冥數已定的觀點。而〈掠剩使〉則貫徹冥司所籍人之命數的觀念，讓陰官執行掠奪人當數而得之外的錢財之職，故事中陰間掠剩使裴璞的議論，表達出人之所得皆有命定，與己之作為無涉，甚至掠剩使的設置就是在維持此一「生人一飲一啄，無非前定」的命定秩序。

### 2. 成仙的可能

在《玄怪錄》中有多則與神仙思想相關的敘事，而對於牛僧孺對道教神仙的

嚮往亦有學者論及。<sup>73</sup>然其所著〈養生論〉則重道德甚於重生，認為人活在世上重要的不是長生與否，而是體現五常之道。即「能養生於道者，生死長短可也。」<sup>74</sup>在〈別志〉一文中則見牛僧孺對仙翁的敬重。《玄怪錄》有關神仙主題的文本，牛僧孺似乎主張成仙的可能或仙境可達，如〈劉法師〉中張公弼帶劉法師至一仙境，因劉法師當下未允諾留住，而終究不能再返，因而深感遺憾；而〈張左〉中張左因登樓思鄉，立即被逐出如仙境的兜玄國，而不可永生；至於〈杜巫〉的杜巫年少未達時得到長白山道士的丹藥，服後不欲食，容色佳，且輕健無疾，後因位登太守，懼以不食驚眾，遂去丹，意圖晚年再服，而被長白道士收回，而後杜巫五十幾年，罄產燒藥不成。這些文本顯示了牛僧孺思考的並非是神仙的存有問題，而是側重在人是否有意志放下俗世去追求，已然呈現了仙／凡辨證的主題。若〈杜子春〉和〈裴諶〉與〈張老〉般可以確定是《續玄怪錄》的作品，則可知《續玄怪錄》將此主題發揮地更為淋漓盡致，以或為世俗所述，或難斷人倫之情等因人智、人情的限制，而無法成仙，去闡釋仙／凡辨證的內蘊，不僅書寫仙境的神異，也更為突顯脫離世俗人情的不易，也因此體現了《續玄怪錄》對《玄怪錄》的「續」之意義。

### 3.理想國度的嚮往

《山海經》中奇異國度是出於遠古初民的想像遐思，而後思想家和文學家則不斷地思索人類理想的生活國度，甚而仙境的構築亦可置於此思維之下。事實上前所述的〈張左〉的「兜玄國」基於仙境的思維所設。雖然對於兜玄國的描述篇幅相當精簡，但以主人翁進入一己前生人物的耳中人之耳之國度而得壽千歲，在時間和空間上同時展現奇異。但〈古元之〉中所記述的「和神國」則令人驚異，牛僧孺以瀕死的夢遊經驗，敘述此一奇異國度，被王夢鷗詮釋為「牛僧孺的幻想國」是牛僧孺窘困之際基於《列子》的「華胥國」而幻設，但相對於華胥國近於道家重視全面而整體的美好生活，「和神國」卻是極其現實的，是一廂情願地幻化人類的飲食起居直至生老病死等問題，幻想的起因是對現實的物質生活不滿足，而非為了逃避現實的社會而作。<sup>75</sup>的確在「和神國」中自然的資源讓人不種而食、不蠶而衣、不養而乘、不釀而飲、不蓋而居，同時無高山峻嶺，四時之氣祥

<sup>73</sup> 王夢鷗：〈《玄怪錄》及其後繼作品辨略〉，《唐人小說研究四集》，頁22-24。

<sup>74</sup> 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卷682，頁7702。

<sup>75</sup> 見氏：〈牛僧孺的幻想國〉，《唐人小說研究四集》，頁149-156。

和，沒有擾害人類的動物，風輕如煦而雨則節降以夜，所以人類不會遭逢自然的災害。而日進一食，但所食不知所化，所以不置溷所。至於婚育，則是以鄰世世為婚姻，必生二男二女。人人長短妍媸均等，也沒有種種的嗜欲愛憎，人的壽命是一百二十，而且沒有夭折疾病殘障之患，百歲以下還有記憶，百歲之外則不可知，最奇特的是「壽盡則欬然失其所在，雖親戚子孫，皆忘其人，故常無憂慮。」一國之人日日相攜遊覽歌詠，暮夜而散。且自相親相惠，沒有求利的商販之輩。此外，人人有謹慎體貼的婢僕，而為官者無職事操斷下人，為君者無職事昇貶千官，故皆不自知其身份，雜於下人和千官之中。牛僧孺的「和神國」針對了人類所有生活的問題和生存所帶來的痛苦，構設出一理想的國度。在此國度中人類可以免於衣食之勞、自然的侵害，甚至可順利的婚育，長壽無疾，還化解了人際、階級的問題，最為重要的是泯除了死亡的痛苦。在這國度中並非只解決物質的生存問題，還包括了因為生存所產生的精神困境。錢鍾書曾於《管錐篇》中評述〈古元之〉認為是「憂生勞生之妄想快心耳。」<sup>76</sup>實為的論，牛僧孺完全從現實生活來設想，固然可以從其早年的窘迫而導致的幻想，<sup>77</sup>但從無勞而獲，且無利無害無災無病，鎮日飲酒遊覽歡歌、長壽有後，甚至死後立即仙化，親人無念無憂，社會和樂，雖有階級但全然平等想望而觀，並非從個人的私利來著想，而是真切地感受到生之痛苦而有的痴人之夢，意圖和悅人的心神，這是「和神國」命名意義之所在，雖遠離現實而浪漫無比，「和神國」可說是《玄怪錄》中最为真實也最虛幻的設想。

《玄怪錄》雖為牛僧孺幻設之作，但仍可於其中掌握牛僧孺對於人世普遍命題如命運、生死等的思維，<sup>78</sup>尤其展現了唐代盛行的富貴神仙的追求和兩者間的折衝，<sup>79</sup>而他對理想國的想像，則跳脫出華胥國的道家思想體現和桃花源的政治烏托

<sup>76</sup> 見氏：《管錐篇》（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797。

<sup>77</sup> 王夢鷗推測〈古元之〉的寫作年代約為唐憲宗元和四年到五年，牛僧孺從縣尉轉任監察御史之前，用以寄託其對於卑官末秩缺乏物質享受的痛感。見氏著：〈牛僧孺的幻想國〉，《唐人小說研究四集》頁156、頁158。

<sup>78</sup> 于天池指出《玄怪錄》「第一次使文言小說專集同作者的身世、經歷、思想、審美趣味發生了緊密聯繫。」見氏：〈牛僧孺和他的《玄怪錄》〉，頁88。

<sup>79</sup> 胡萬川陳述唐代道教興盛，在道法和世事兩不相濟的思想背景下，神仙與富貴只可擇一的故事相對風行。見氏：〈神仙與富貴之間的抉擇——唐代小說中一個常見的主題〉，收錄於《真假虛實——小說的藝術與現實》（臺北：大安出版社，2005年），頁17。

邦，而是一關乎現實民生的生存樂園，創造了一前所未見的理想國度。

#### （四）關切時事

關於前述的命定思維、成仙的可能和理想國度的想望，皆為《玄怪錄》對人生所作的思考，在幻設的文本中，也可以探得牛僧孺對時事的關懷。前述「和神國」中壽盡之人立即失其所在，親族子孫忘而無憂戚，王夢鷗從史實推斷，牛僧孺有此免於喪葬的設想，殆與儒家立神主、建祀廟的祭祀之禮有關。根據《新唐書·陳京傳》的記載，德宗建中初年為舉行祭祀遠祖的大祫，為廟次不對，太常博士開始提議，一討論便是二十年沒有解決，韓愈還寫了〈禘祫議〉奏上，至元和元年七月，順宗的神主如何安頓，太常博士又引發了討論。由此而推論，牛僧孺殆有感而發。<sup>80</sup>王夢鷗從唐代祭祀去思考「和神國」，自可備一說。然而從牛僧孺所撰〈別志〉一文中記述：「僧孺見仙翁兄，深仰其為真人也。僧孺讀史傳，嘗病仙者能上升，鄙見也斯不然。僧孺聞胡國西胡法，至其將歿之日，必大會族黨州里，眾其人，齋其食，人則飄飄而發地焉，數百里外而墜窮谷中。國中人咸謂曰化，予焉知非胡國之幻乎？」<sup>81</sup>可見其對於死後所趨甚為關切，「和神國」死後忽失的設想，亦可能純粹出於對死後歸趨和死亡對生者的意義之思考。錢鍾書甚至認為〈古元之〉所言全取自佛典《彌勒下生經》和《長阿含經》之三十《世紀經·郁單曰品》第二。<sup>82</sup>又王夢鷗認為〈董慎〉一篇為《玄怪錄》中似有寓意者，他判定此文是牛僧孺早歲的戲作，但卻述及《舊唐書》的牛僧孺本傳中所記載長慶二年，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賊當死，卻賄賂宦官為之申理，身為御使中丞牛僧孺卻堅執不回，不容李直臣屈法事。而論斷雖是後事，起意則早。<sup>83</sup>王夢鷗對於此篇為牛僧孺早歲之作的主張，殆以《玄怪錄》為溫卷之作，若拋卻此一拘泥的觀點，正視《玄怪錄》中有牛僧孺通籍以後，甚至位居高官時的作品，根據《舊唐書》本傳記述之實，正是〈董慎〉一篇堅守法理的寓意之所在。

前述〈古元之〉和〈董慎〉所隱含對現實禮法制度的，必須抉發牛僧孺的生平背景加以參照，但《玄怪錄》中卻有在文本中直接就觸及現實政事者，如〈郭代公〉中鄉老質疑郭元振傷害烏將軍，郭元振則申述：「夫神，承天而為鎮也，

<sup>80</sup> 見氏：〈牛僧孺的幻想國〉，《唐人小說研究四集》，頁154。

<sup>81</sup> 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卷682，頁7702。

<sup>82</sup> 見氏：《管錐篇》，頁797。

<sup>83</sup> 見氏：《〈玄怪錄〉及其後繼作品辨略》，《唐人小說研究四集》，頁8。

不若諸侯受命於天子而疆理天下乎？……使諸侯漁色於中國，天子不怒乎？殘虐於人，天子不伐乎？」則藉由烏將軍譴責藩鎮，是故楊義便以為〈郭代公〉是「小說借題發揮，以唐朝上升期勛臣誅滅豬妖的靈怪故事，寫成了一個在藩鎮割據時代思治亂而致小康的寓言。」<sup>84</sup>鄧郁生認為牛僧孺刻意錯亂時空，將在開元元年已卒、治邊有功復為賢相的郭元振置於開元中，藉其任俠且不畏妖邪的形象，剷除如藩鎮般魚肉鄉民、強取婦女的烏將軍，企圖「示藩鎮以箴規」。<sup>85</sup>在〈故丞相太子少師贈太尉牛公神道碑〉中述及牛僧孺為相時「方鎮以不廉聞者輒奏貶，以賄賂求進者必阻之。」<sup>86</sup>可見其對藩鎮的態度。<sup>87</sup>

而〈掠剽使〉中除了裴璞發表命定的議論外，裴璞無暇與元方好好敘舊的原因是「本司廨署，置在汧隴間，吐蕃將來，慮其侵軼，當與陰道京尹，共議會盟。雖非遠圖，聊亦紓患，亦粗安邊之計也。戎馬已駕，來期不遙，事非早謀，不可為備」而「俄而蕃渾騷動，朝廷知之，又慮其叛，思援臣以為謀，宰相蒞盟，相國崔公不欲臨境，遂為城下之盟，卒如其說也。」牛僧孺用一平行於此世的陰間同樣遭逢吐蕃之禍，來預示將發生的事件。根據《新唐書》的記載，長慶元年，吐蕃來犯並乞盟，當時確實是崔植、杜元穎、王播輔政，而當時牛僧孺為御史中丞，也參與了此次於京師西郊的會盟。牛僧孺將這次的會盟用此「志怪」情節，將之紀錄，同時也表達對於安邊之計，必須早日謀劃的觀點。現今牛僧孺所存留的文章中，就有〈守在四夷論〉一篇，在談論如何才是真正的防守四夷之道。無獨有偶地是〈崔環〉中以崔環在陰司所見，預示「河中節度使司徒薛公平議奏分河一枝，冀減衝城之勢。初奏三丁取一，既慮不足，復奏二丁役一」事，在今本的《玄怪錄》中敘述崔環在冥中的經歷，並未見陰冥對分河取丁的觀點，卻於《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引《幽怪錄》的「分河取丁」一則敘及：「常有人自冥司放還，道中人聞人語云：『欲分黃支，前者要令三丁取一，計工不集，令請二丁取一矣。』」<sup>88</sup>

<sup>84</sup> 見氏：《中國古典小說史論》，頁 159。

<sup>85</sup> 見氏：〈示藩鎮以箴規：論《玄怪錄·郭代公》的政治訓教〉，《東吳中文學報》第 24 期（2012 年 11 月），頁 59-90。

<sup>86</sup>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 888，頁 5573。。

<sup>87</sup> 雖然牛僧孺不同於李德裕父子削藩而主張對藩鎮採懷柔的政策，因此遭受《新唐書》的貶抑。但有學者這是基於朝廷實力的考量，以免無功而致天下。詳見朱桂：《牛僧孺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76 年），頁 86-87。

<sup>88</sup> 〔宋〕委心子撰，金心點校：《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頁 267。



沈亞之曾撰作〈魏滑分河錄〉詳述元和九年薛平分河事。<sup>89</sup>

〈岑曦〉、〈韋氏〉兩篇，雖都在演繹命定的思維，但都關涉到政治事件，李潤強便認為〈岑曦〉是假借鄭知古夜見大鬼陰靈的神異經驗，影射李隆基對太平公主的宮廷政變。<sup>90</sup>而〈韋氏〉中則涉及徐敬業興復唐中宗事。<sup>91</sup>其他如〈蕭志忠〉、〈崔環〉、〈吳全素〉諸則中敘述神祇、冥吏亦貪婪受賄，不難察覺其中的譏諷之意。

汪辟疆在談論《玄怪錄》展現藻思的議題時，是將〈元無有〉與韓愈〈毛穎傳〉和柳宗元〈河間傳〉並提，這兩篇往往被歸類為小說或亞小說的文本，在「奇詭」的文風外，更為重要的撰作意旨是藉之說理。而韓、柳二人文集中出現許多相似的人、物傳記都有相同的文體特色，如〈圯者王承福傳〉、〈種樹郭橐駝傳〉、〈梓人傳〉、〈宋清傳〉、〈童區寄傳〉、〈蝮螫傳〉、〈謫龍說〉等。而在現今牛僧孺所存的文章中，可見〈譴貓〉、〈雞觸人述〉二文，名為記述貓、雞，實際卻是，藉之論為臣之道，此以動物為說的作品，近於寓言之作，牛僧孺與韓柳皆有交誼，<sup>92</sup>此亦可以理解相似的撰作風格，重要的是在《玄怪錄》的撰作中，牛僧孺也融入了雷同的手法，於是在幻設的文本中，不僅是「奇誕」的美學風格展現，且可以之逞才，於其間書寫各式文類，甚而寄遇了牛僧孺意圖抒發思考人生和關切時事的論述，雖然不是以懲戒為訴求，但絕非無寓意可尋，如此「幻設」便成為「寓言」之修辭。

<sup>89</sup> [唐]沈亞之著，蕭占鵬，李勃洋校注：《沈下賢集校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59-60。《新唐書》卷111〈薛仁貴傳〉附〈薛平傳〉亦記述了薛平治河之事。

<sup>90</sup> 見氏：〈牛僧孺傳奇創作研究〉，《西北師大學報》第39卷第3期（2002年5月），頁43。

<sup>91</sup> 文本中敘述「神龍中以徐敬業有興復之謀」，「神龍」（705-706）為唐中宗復位之年號，且徐敬業且於中宗嗣聖元年（684）被武則天派兵征伐時死亡，可見牛僧孺刻意地錯亂歷史時間。

<sup>92</sup> 牛僧孺與韓愈的交誼已見前述。至於與柳宗元的關係，杜牧的〈唐故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贈太尉牛公墓誌銘〉記載：「故丞相韋公執誼，以聰明氣勢，急於褒拔，如柳宗元、劉禹錫輩，以文學秀少皆在門下，韋公亟命劉、柳於樊鄉訪公」，[唐]杜牧著，吳在慶校注：《杜牧集繫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701。

#### 四、結語

從〈周秦行紀論〉以「多造隱語」評論《玄怪錄》開始，便已觀察出《玄怪錄》所述「玄怪」具有出於作者刻意為之的敘述特質，而魯迅則進一步抉發文本中展現與當時唐代小說力求見信相背的虛構玄怪詭設之跡的敘述特色，而引發了後繼的討論。本篇依據前人的研究成果，進一步的闡釋和探索，得知《玄怪錄》以人物命名的虛構化、故事時地背景與現實的脫離、擬人化和諧隱的修辭和以「志怪」題材為撰作憑藉等敘述手法，作為顯示幻設的策略。至於《玄怪錄》施展此一敘事策略的用意和目的，本文則從歷來對《玄怪錄》撰作意旨的見解來思考。雖然明代胡應麟已經同時以「好奇語誕」和「文士寓談」兩個面向來評論全書，但近世諸家猶擺盪在好奇語誕的興趣追求和有所寄寓之間，各有偏重，致使全書的撰作意圖有興趣／興寄的不同判定。檢視《玄怪錄》刻意顯示幻設的文本，則可探知全書的撰作有出於純粹對「奇誕」的興味者，與元和崇尚奇詭的文風息息相關，亦不脫文士「徵異話奇」撰述小說的時代風氣；又牛僧孺有意運用幻設手法，營造馳騁才思的空間，盡情地創作詩文，發抒議論，以現才識，體現了唐代小說兼具史才、詩筆、議論的文體特質。而經由本文的探討，《玄怪錄》「多造隱語」確有其假借奇誕而欲傳達的意念，包括了人生命定、修行成仙和生存的理想國度的設想等普遍性的議題，以及對所處時代現實政事和禮法的關切。因此《玄怪錄》自見構想之幻和顯露詭設之跡，並非純然是為了嗜奇和逞才，實亦意圖藉之表達對人生和現世種種議題的看法。即《玄怪錄》施展顯示幻設的敘述策略的作意，既有興趣亦有興寄。

謹誌：本篇初稿曾發表於第十八屆唐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經增訂後正式發表。特此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給予寶貴意見，致使本篇更臻完備。

## 徵引書目

### 一、古籍

牛僧孺撰，李復言撰，程毅中點校：《玄怪錄續玄怪錄》，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王定保撰，陽羨生校點：《唐摭言》，《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王弼著，樓宇烈校釋：《周易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永瑤等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李昉等編，夏劍欽、王巽齋校點：《太平御覽》，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_\_\_\_\_：《文苑英華》，臺北：華文書局，1965年。

\_\_\_\_\_：《太平廣記》，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

李時人：《全唐五代小說》，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李肇著，曹中孚校點：《唐國史補》，《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李德裕著，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杜牧著，吳在慶校注：《杜牧集繫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沈亞之著，蕭占鵬，李勃洋校注：《沈下賢集校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

委心子撰，金心點校：《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洪邁著，〔清〕阮元輯編：《夷堅志乙》，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

胡應麟著：《少室山房筆叢》，上海：上海書店，2009年。

晁公武編，孫猛校：《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高儒著：《百川書志》，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

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臺北：洪氏出版社，1975年。

趙彥衛撰：《雲麓漫鈔》，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

魏收撰：《魏書》，臺北：洪氏出版社，1977年。

魏徵等撰：《隋書》，臺北：洪氏出版社，1974年。

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 二、近人文獻

于天池：〈牛僧孺和他的《玄怪錄》〉，《中華文史論叢》第2輯（1986年），頁67-84。

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四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78年。

——：《唐人小說校釋》，臺北：正中書局，1988年。

朱桂：《牛僧孺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76年。

吳玉蓮：〈〈杜子春〉讀後〉，《文藝月刊》156期（1982年6月），頁86-103。

李宗為：《唐人傳奇》，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

李潤強：〈牛僧孺傳奇創作研究〉，《西北師大學報》第39卷第3期（2002年5月），頁41-45。

李鵬飛：《唐代非寫實小說之類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汪辟疆：《唐人小說》，臺北：世界書局，1980年。

林慶彰主編：《國際漢學論叢（第一輯）》，臺北：樂學書局，1999年。

俞鋼：《唐代文言小說與科舉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柯慶明，林明德主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小說之部（二）》，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77年。

胡萬川：《真假虛實——小說的藝術與現實》，臺北：大安出版社，2005年。

徐志平：《續玄怪錄研究》，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年。

康韻梅：〈唐代小說「文備眾體」之研究——以趙彥衛的「文備眾體」說及其指涉的相關議題為主〉，《唐代文學研究》第14輯（2012年7月），頁660-678。

——：《六朝小說變形觀》，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14年。

陳珏：《初唐傳奇文鈎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程千凡：《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程毅中：《唐代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

楊義：《中國古典小說史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

鄧郁生：〈示藩鎮以箴規：論《玄怪錄·郭代公》的政治訓教〉，《東吳中文學報》第24期（2012年11月），頁59-90。

魯迅：《魯迅小說史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3年。

賴信宏：《志怪到傳奇的遞嬗研究——述異話奇的書寫成規與知識利用》，花蓮：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7 年。

錢鍾書：《管錐篇》，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 The Fic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Author's Intention of *Xuanguai lu*

Kang, Yun-mei\*

### [Abstract]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is paper is *Xuanguai lu*, an important work of Tang stories written by Niu Sengru. Scholar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claim that *Xuanguai lu* shows different purpose from other Tang fiction on the pursuit of “fictional” instead of “real”, so this paper will extensively explore the fic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imaginary narrative features of this work. From the extant texts, the paper finds out its characteristics as the following: the fabrication about the names of the fiction figures, the unreality of the time-and-space background, the personification and parody of the rhetoric, and the use of Zhiguai as its subject matters. In the meantime, this paper digs out the multiple motivations of Niu Sengru: the curiosity about the fantasy, the display of his literary talents, the exposition of his thoughts, and the concern about current affairs. To sum up, this paper aims to respond to the general evaluation of *Xuanguai lu*, and to highlight its compiling intention both of interest and of allegory.

**Keywords:** Tang fiction, Niu Sengru, *Xuanguai lu*, *Xu Xuanguai lu*, fictional, fable.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